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老人與假訊息：高齡者提升數位素養研究

The Elderly and Misinformation: A Study for Improving
Digital Literacy for Older People

吳穗菱

Sui-wen Wu

指導教授：林照真教授

Advisor: Chao-Chen Lin,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July 2023

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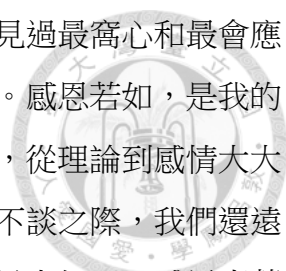
碩士生涯說長不長，一轉眼居然三年過去。我回首 22 歲至 25 歲的點點滴滴，心中感慨萬千，彷彿飛逝的日子如昨日，歷歷在目。我從不是一個念舊的人，除了記性差之外，想念過去會讓人捨不得往前。但是在此論文即將被添上它的最後幾筆，我也正要邁入下一個人生旅程，想感謝一路上給我帶來特別回憶的人。

感謝當初有膽無識的自己，三年前誤打誤撞從中國回到臺灣，從原本打算的英漢翻譯，毅然決然選擇新聞。還好，這是喜歡的一條路。感恩媽媽，風雨無阻地支持我的所有決定，一直提醒我要過得開心。在成長的路上，我有許多叛逆的時候，你卻始終如一支持我，讓我能夠無憂無慮地任性。感恩手足哥哥和萱萱在我備感壓力時，當我的開心果，帶我衝浪和聽我傾訴心事。感恩皮哥，你是我最忠實的聽眾，感恩你無時無刻都願意黏在我身邊，讓我體會被愛的幸福。謝謝你陪伴的 16 年，雖然我四處流浪，少了很多陪伴你的時間，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遇見你的我有多麼幸運，我會一直想念你。

臺大新聞所是個好地方。照真師是讓我入門新聞的恩師，也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感恩照真師的耐心、細心和用心，放手讓我選擇做想做的題目，第一時間回覆所有郵件和訊息。照真師的存在，是只要你回頭，就能看到她在身後守護著的影子。感恩照真師始終在目送我，讓我往前闖，又目光追隨著，讓人想起龍應台寫下的背影。我始終感到幸運和感激，再次感恩照真師在百忙之中願意指導我。

感謝谷玲玲老師，收我當研究助理的三個學期，我蹣跚學習如何做研究，也與老師話家常，瞭解新聞業態的大小事。玲玲師開的英文寫作這門課，對我現在的職涯道路是重要推力，回想起來人生真的充滿機遇和轉機。感恩麗雲師、錦華師、好迪師的教導和教誨，新聞所的課程門門都是扎實的實作戰場，出社會之後更加懂得，有學到受用的東西。

要謝謝與我並肩作戰的同學朋友們，這路上有你們互相鼓勵和幫助，真的太好了。感謝緣緣的陪伴與支持，從開學茶會到畢業典禮，有你的時候我都很開心，虎



頭蜂會多留一點時間給你！感恩荷庭，我的正能量同桌，是我見過最窩心和最會應援的寶藏女孩，打氣詞彙滿滿，跟你聊天後的我總是充滿能量。感恩若如，是我的職涯引路人，介紹給我的小聚如今也成為我的第一份正職工作，從理論到感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聊，是我重要的知心朋友。感恩方妤，無話不談之際，我們還遠程給對方加油打氣，邊工作邊讀書很不簡單，能夠彼此作伴真是太好了。感恩嘉蓮當我的口試助理，在論文後期這段路有你許多叮嚀提醒，我安心很多。感恩立安、睿鴻、玲臻、綺薇、曉雯、思皓、文超、吳雙，還有很多新聞所同學，都讓我的碩士生涯充滿笑聲與快樂回憶。感恩章彤，我最喜歡的南大學姊，與你吃飯聊天總是非常愉快。感恩 Jak 總是堅持拉我出去玩，跟你一起真的都蠻好玩的。

前往比利時交換的一年裡，我收穫很多。最重要的是認識 Charlotte Van Langendonck，一拍即合的我們半年後再次見面，是你讓我對比利時產生不一樣的情感連結，回到歐洲竟然也會有一種歸屬感。還有 Natsumi、Alice、Anna、Noemi、Agne 和 Sarunas，在遙遠的他鄉能夠遇見你們，讓交換生活有趣許多。感恩楷文、采芯、堯棟、宇彤還有在歐洲相遇的同鄉人，讓我的交換生涯多了很多趟歐洲旅行，創造美好的旅途回憶。

在職涯上，我非常幸運地遇到許多貴人。感恩 Taiwan News 的 Chris, Lyla, Jules, Sophia 和 Kelvin，沒有你們，我不會在英文新聞寫作上走那麼遠，你們總是給予我最大的幫助，盡可能讓我發揮、成長、或犯錯，並且從不吝嗇讚美。特別感謝 Lyla，總是直來直往、伸張正義、且善良大方的你，是我第一個理想中新聞人的榜樣。Taiwan News 是我第一份新聞相關的實習，很有挑戰性也讓我受益匪淺。感恩不完美工作室的馬克司與艾筠，在這個工作室打工學習到細膩的態度，你們總是會給予許多溫柔的意見供我參考，也十分願意提供我幫助，包括協助我順利取得交換的獎學金。

感恩創業小聚，因緣際會開始接觸科技議題，不僅影響我日後的職涯規劃，也在過程中學習接觸到除了新聞寫作之外的不可計量的事情。其中，感恩我的同事可婕和冠宇，與你們工作讓我懂得團隊精神。感恩與我同期的實習生庭萱和家齊，緣分讓我們總是無話不談，一起工作實在是太快樂了！感恩柯旂和你聰明的大腦，一年的遠距工作給我很多機會採訪寫作，同時不斷督促我多多進修。交換回來後我轉任實習生，你更是讓我嘗試主持和企劃，讓小聚的工作一直充滿新鮮感和挑戰。一

起共事兩年，你身兼朋友和 mentor，幫我介紹論文的採訪對象，希望我有如你期望長進不少，以後再請多多指教。

三年的求學求職生涯，並非風平浪靜。感恩廖國崑，始終支持我的決定並鼓勵我勇敢往前。特別感恩你的家人大力支持，在我尋尋覓覓論文受訪者時提供很多幫助。感恩你不厭其煩提供我論文的架構和格式的建議，在許多時刻都理智且堅定地接住我。

最後，再次感謝我的家人。阿嬤、舅舅、舅媽和阿姨、巧巧都是我在台灣最堅實的避風港。謝謝你們，始終如一地鼓勵和支持，我會加油繼續下一段旅程。

中文摘要



近年來，假新聞在臺灣和全球成為日益嚴重的問題。假訊息不僅限於政治領域，也涉及商業行銷和公共健康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高齡者成為假新聞的主要受害者。由於數位落差和認知功能可能的退化，他們在辨識和查核信息方面遇到困難。因此，提高高齡者對不實訊息的辨識能力，並降低假訊息數星，則是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問題。

本論文探討臺灣高齡者如何在數位媒體環境中，識別並應對假訊息。透過詮釋現象學的質化研究方法，本論文研究發現，高齡者在使用社群媒體時，其資訊分享行為的動機更多的是維繫人際關係，而非資訊本身的真偽。這種社交動機讓假新聞得以在高齡者間傳播。以健康為主題的假訊息尤其流行，因為它們被視為關心與照顧他人的方式。

此外，高齡者的數位媒體素養面臨挑戰，在面對新的數位技術時，他們普遍存在對年紀大的不自信和對學習新事物的恐懼。然而，透過長期的網路使用經驗，部分高齡者已能識別出假訊息的特徵。家人好友的協助查證，也是高齡者抵禦假訊息的重要方式。

本論文指出，提升高齡者的數位媒體素養，不僅需要增強他們對假新聞的識別能力，更需要激發他們的網路學習興趣，並將其視為一種社交工具，以此提升他們的社會參與感和幸福感。本論文研究亦發現，社區服務能夠有效幫助高齡者建立對網路社交和網路使用的積極態度，使高齡者更順利地進入數位時代。

關鍵字：數位媒體素養、高齡者、假訊息、網路技能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of misin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globe. The emergence of false information is not confined to the political arena; it also encompasses commercial marketing and public health issues. Older individuals are becoming the primary victims of misinformation. Due to the digital divide and potential cognitive decline, they face challenges in identifying and verifying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ducing the misinformation and enhancing people's ability to recognize misinform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elderly cope with the issue of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By using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to learn primary motivation of senio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y spread false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regardless of the information itself, but to maintain interpersonal social relations.

They ar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health-related messages, and misinformation often exploits this by spreading under the guise of "concern for health". Moreover, the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of the elderly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lack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ystems leaves them uncertain and uneasy when dealing with the unfamiliar world of the Internet.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a lack of interest is a huge barrier to improving media literacy among the elderly. It is suggested that by offering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services, we can help the elderly develop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s, enhancing their digital media liter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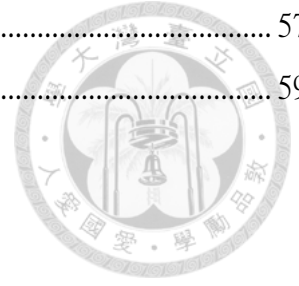
Keywords: Digital media literacy, the elderly, misinformation, internet skill

目 錄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致謝.....	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
目 錄.....	vi
表目錄.....	vi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	1
第二節、問題意識.....	4
第二章、理論文獻梳理.....	6
第一節、高齡者與假訊息研究.....	6
第二節、高齡者數位落差研究.....	11
第三節、高齡者與數位媒體素養.....	15
第三章、研究方法.....	20
第一節、研究取向和方法.....	20
第二節、半結構深度訪談.....	21
第三節、研究對象.....	21
第四節、資料搜集.....	23
第四章、研究發現.....	25
第一節、高齡者追求網路互動多於接收訊息.....	25
第二節、人情因素加速資訊傳播.....	28
第三節、高齡者重視人際關係，可能妨礙虛假訊息查核.....	32
第四節、高齡者對數位機制感到陌生，影響假訊息即時澄清.....	34
第五節、高齡者逐步學習尋求親友、專家查證與闢謠.....	38
第六節、高齡者自我感覺「不再年輕」，需要親友鼓勵.....	43
第五章、研究結論.....	52
第一節、關注高齡者的假訊息研究.....	52

第二節、研究貢獻、限制與研究建議	57
參考文獻	59



表目錄



表 3-1 高齡受訪者資料.....	22
表 3-2 媒體素養教育工作者受訪者資料.....	23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近幾年來，國內外相關研究都指出，假新聞不斷在臺灣出現。總部位於瑞典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的獨立調查機構 V-Dem 研究所進行一項跨國學術調查，結果指出，臺灣遭受境外假訊息侵擾嚴重程度，從 2013 起連續 9 年排名世界第一（V-Dem, 2018）。國內事實查核團體 MyGoPen 自 2015 年成立以來，累積大量不實訊息資料庫，在臺灣最受歡迎的社群平台 Line 上，有 18 萬使用者。MyGoPen 數據顯示，臺灣社群平台上遭到分享的內容中，有 6 成不實或爭議訊息來自海外網站，且細看網站內容，其帶有簡體字的照片、中國用語，或是中國官方宣傳訊息（劉致昕、柯皓翔、許家瑜，2019）。

臺灣的假消息有些也是因為商業行銷手法導致。2018 年 2 月底，大潤發公司為了促銷自家產品衛生紙，向媒體發出「衛生紙確定大漲 30%，賣場業績急飆 5 倍」的假消息。聽聞消息，民眾爭相搶購衛生紙，各大實體賣場的貨架被一掃而空，經由行政院盤查才發現真相。大潤發公司發佈不實資訊誤導民眾，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遭罰 350 萬元（公平交易委員會，2018）。

「衛生紙之亂」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竟以相似的劇情再次上演。2020 年 2 月初，三名網友在不公開臉書社群散播「因應原料都拿去做口罩，衛生紙估計會短缺」的資訊（林育萱，2020）。根據《網路溫度計》（葛緯詩，2020）報導，這一假消息的網路聲量在三天內由日均 30 筆左右竄升到超過 1500 筆，引發民眾再次搶購衛生紙。

假訊息引發的亂象層出不窮。臺灣自 2021 年 5 月起至 9 月 10 日起，檢警共偵辦 636 件假訊息相關案件，移送了 489 人。其中一則假新聞指出臺灣單日 COVID-19 新增確診數暴增，消息一由社群平台傳出便引發民眾恐慌，並導致台股一度重創（黃雅琪，2021）。

根據網路資安公司趨勢科技的統計，自疫情爆發以來，僅僅在疫情傳播最高峰的 2020 年 2 月份，就偵測到假消息數量高達 20 萬次，暴增 203%（陳佳君，2020）。學界研究結果也顯示，當有關疫苗的假新聞佔所有疫苗新聞的 39.3% 以上時，會對下一週的疫苗施打率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Chen, Chen, Yang, Lai, Huang, Chen & Tu, 2022）。若能減少假新聞數量、或是提升民眾對於不實訊息的免疫力，將有助於維護公共健康。

假新聞肆虐的現象並非臺灣獨有，是全球都面臨的棘手問題。一項有關波蘭社群平台分享醫學資訊的研究發現，計有四成的連結內容裡夾雜不實資訊，且這些消息在 2012 至 2017 年五年間，分享超過四十五萬次（Waszak, Kasprzycka-Waszak & Kubanek, 2018）。全球綜合數據資料庫 Statista 在 2020 年 3 月進行的美國假新聞調查指出，在他們調查的 8,914 受訪者中，有八成的人表示曾經閱讀過與疫情有關的假新聞（Watson, 2020）。另一項由歐盟進行、涵蓋 28 個歐盟國的線上假新聞和不實訊息調查發現，有 83% 的受眾認為假新聞對民主自由的價值不利，尤其擔心惡意的謠言會影響選舉和移民政策（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假新聞本身帶有獵奇和情緒煽動的性質，形成「謊言比真相散播快」的局面（Vosoughi, Roy & Aral, 2018）。假新聞不僅影響公共決策，還會影響到個人健康。就有研究提到，假新聞將有可能造成心理疾患、恐慌、害怕、抑鬱及疲勞（Rocha, de Moura, Desidério, de Oliveira, Lourenço & de Figueiredo Nicolete, 2021）。

在面對假新聞氾濫的社群媒體時，高齡者首當其衝。高齡者並非數位原生世代，很晚才接觸智慧型手機及電子設備，大多數高齡者不熟悉電子產品的功能及使用方法，更難分辨數位資訊的來源和真實性。困於數位落差的高齡者，更可能成為假新聞鎖定的目標。一項由普林斯頓大學跟紐約大學執行的研究顯示，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65 歲以上的使用者分享假新聞網址的文章的數量，是較年輕族群的七倍（Guess, Nagler & Tucker, 2019）。另一研究不僅發現同樣結果，還提出老年人之所以更多地分享假新聞，部分原因是由於高年引起的認知功能退化，對於事物的辨別能力降低（Brashier & Schacter, 2020）。同時，老年人通常是社群媒體新手，對平台的不熟悉也阻礙他們辨識訊息，如贊助內容和經過處理過的圖片。高齡者有限的數位能力，會阻礙其對於訊息真假的判斷，更遑論對訊息進行查核。台灣事實查核

教育基金會報告指出，50 歲以上民眾的查核經驗比例為各年齡層中最低，訊息辨識能力相比較弱（邱俊維、張嘉萍、詹景涵、葉香伶，2022）。

在不同國家，老年人受騙於數位媒體上的不實資訊屢見不鮮。美國地方媒體 WOWK 13 News 曾報導一起詐騙案，一名奈及利亞男子註冊虛假的網路帳號，從約 200 名受害者身上騙取共兩百五十萬美金，其中大部分受害者為老人（Barber, 2022）。泰國媒體基金會（Thai Media Fund）也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年長者正在使用網路媒體，由於缺乏相關數位技能，使得他們更容易受騙於詐騙和假消息（Ratcliffe, 2022）。其中，疫苗、保健食品等醫藥相關的不實資訊不僅讓許多老人掏腰包付錢，還影響了身體健康。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一項研究（Basiouny, 2022）提到，在調查的共 31,000 個門戶中，有 10% 的人被歸類為假新聞的「狂熱讀者」。意指他們在閱讀主流新聞的同時，花費在閱覽假新聞的時間高於平均值。而這些「狂熱讀者」中，通常年紀較大，教育程度也較高。

針對長輩傳播假新聞這一現象，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報導中指出，長輩從傳遞「長輩圖」中來獲得社交的利益，與內容本身的真實性無關。同時，長輩也有資訊需求，例如對身體隱患的焦慮，從而在魚目混珠的網路上尋找資訊，以致聽信錯誤的資訊（劉芮菁，2021）。大部分長輩流傳的假新聞跟健康、生命安全有關，正是由於長輩對健康議題的資訊十分關心，使得假新聞抓住此心態而得以散播出去（姊妹淘，2021）。另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調查，許多長輩活躍於社群網站和即時通訊軟體（莊貿捷，2021）。但在使用這些傳播工具時，因無法辨認訊息真偽且不會查證，容易轉傳不實資訊，淪為假訊息的受害者和幫兇。

假新聞口耳相傳，沒有使用互聯網的老年人更加不容忽視。《關鍵評論網》也指出，COVID-19 疫情爆發讓科技與網路更加普及，卻加劇高齡者資訊焦慮的現象（伊佳奇，2021）。中國於 2020 年 2 月，開始採用定位追蹤應用程式「健康碼」，作為個人的電子通行證（賀軍，2020）。而中國有將近兩億五千四百萬的老年人口，其中僅有六千萬左右的長輩會使用智能手機（柴敬博，2021）。而無法出示健康碼的高齡者，無法出門、就醫，影響到日常生活，且引發「老人因無健康碼遭公車拒載」等事件（方立平，2021）。

時隔一年，中國部分地區才推出「健康防疫核驗系統」，即以識別身份證件取代電子健康碼，破解老年人的「數位鴻溝」（張靚雯，2021）。中國武漢大學互聯網全齡化實踐隊進行的《中老年人使用互聯網情況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多達 78.6% 的中老年人不上網，並且社會上幫助老年人使用網際網路的資源過少，有八成以上的中老年人表示在上網時會遇到困難（謝子霖、屠正洋、姚望、施尚潔、潘辰昊、徐榕榕、陳亦瑄、馮鼎銘，2015）。

老人在科技快速更替的過程中，逐漸處於邊緣化的位置，不利於人際關係（伊佳奇，2021）。對社交媒體的使用不熟悉且社交圈較小，均為高齡者比年輕人更容易傳播假消息的原因。且社會常帶有刻板印象，認為轉傳錯誤消息便是認知退化、無法辨別真假（蔡慧君、戴榮賢，2020）。

從事教導長輩辨識假新聞的民間組織《假新聞清潔劑》也表示，高齡者出於關心等社交需求傳播資訊，被糾正消息有誤，心有不快，常常導致謠言未消除，反而出現溝通傷感情的局面（郭琇真，2021）。由此一來，假新聞不僅頻頻讓高齡者誤入圈套，還間接破壞代際關係，是廣大民眾應引起高度重視的社會問題。

第二節、問題意識

事實查核團體「MyGoPen 麥擱騙」在臺灣推動事實查核服務與媒體識讀教育，並於 2021 年 9 月經過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FCN）認證（MyGoPen,2021）。創辦人葉子揚表示，設立《MyGoPen》的初衷是觀察到親友長輩受到不實訊息影響，因此希望能協助長輩們闢謠（吳玲臻、陳柏樺，2022）。不止 MyGoPen，由公民自發組成的協會《假新聞清潔劑》也走進社區，為高齡者提升數位媒體識讀的能力，打擊假新聞（願景工程，2019）。這些組織透過提供高齡者查證工具與媒體識讀教育的實踐中，累積許多高齡閱聽人應對假新聞的經驗與數據。而這些資料能夠為高齡化社會帶來啟示和參考，讓臺灣中高齡群體的媒體識讀教育得以普及。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資料顯示，臺灣將於 2025 年由高齡社會邁入超高齡社會，即 65 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因此，對於高齡者數位素養能力的教育規劃和研究，實刻不容緩。

目前臺灣高齡者的數位素養教育普及化工作，面臨以下幾個挑戰：一是國內對於數位媒體素養以青少年及學生群體為主，對高齡者媒體素養教育的研究及探討少之

又少。中高齡族群是媒體素養學術研究的黑洞，該群體對於媒體素養教育有其迫切性的需求，卻是最被忽略的一群（柯舜智，2020）。學者江宜芷、林子斌和孫宇安（2018）整理發現，臺灣 2002 年至 2016 年間共發表 82 篇媒體素養相關研究，其中 54 篇以小學生為研究對象，6 篇針對國中生，6 篇研究高中職生，16 篇以大學生為主，並未涉及高齡者。可見臺灣缺乏以 65 歲以上高齡者為對象的相關研究。

其次，因為長輩可能傳播假新聞，成年子女又不理解長輩的需求，使得溝通升級成家庭衝突（陳彥琪，2020）。同時，國外有眾多的量化研究歸因於老人的認知功能退化，對於高齡閱聽人消費新聞的模式和社交狀態較少琢磨。

綜上所述，本論文希望聚焦於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探討國內較少人關心的高齡者與假新聞問題。本論文將採取詮釋現象學的研究方法，進一步訪談事實查核工作人員、志工，並且訪問若干高齡者。並希望能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 一、探究高齡者消費新聞時的情境和所處的社會脈絡，分析假新聞有機可乘的原因？
- 二、高齡者在面對假新聞時，如何判斷、運用和查證？
- 三、因應數位時代，高齡者面臨的主要困難為何？
- 四、探究如何針對高齡者需求，有效提升老人的數位媒體識讀能力？

第二章、理論文獻梳理



第一節、高齡者與假訊息研究

假新聞、不實訊息、錯誤訊息等概念，在傳播學上有諸多定義。不少學者認為，假新聞並非與新聞有關，而表示該現象指涉關乎整個資訊生態系統（林照真，2020）。學者楊惟任提出，假新聞包括「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和「惡意訊息」(mal-information)（2019）。以上三種資訊，均為不實訊息，經由網路和媒體傳播的錯誤資訊。因此本論文所採用的「假新聞」、「假訊息」等概念，指的是網路上傳播錯誤資訊之統稱。

假訊息與高齡者的相關研究，主要探討高齡者相比其他年齡的群體，是否更容易相信假訊息，或是較易受到假新聞的影響。這方面研究最廣為人知的調查，即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一研究指出，年齡越大，在臉書分享假新聞網址的文章次數越多，其中65歲以上的高齡者從假新聞網址中轉發假新聞並分享至臉書的次數是年輕族群（18-29歲）的七倍（Guess et al., 2019）。美國東北大學網絡科學研究所（Network Science Institute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同樣針對該年美國總統大選研究發現，社群平台推播假新聞給個人的比例，取決於用戶的年齡和閱覽的政治新聞數量，用戶年齡越大，接觸到的假新聞來源更多（Grinberg, Joseph, Friedland, Swire-Thompson & Lazer, 2019）。而分享假新聞的行為又與撰寫有關政治的貼文、假新聞的接觸度及政治傾向息息相關。調查統計，16442名民眾登記於美國公民投票系統後，其推特賬號被推播到政治相關的新聞內容。且該研究結果顯示，推播到新聞內容的年齡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年齡越大的用戶，越有可能分享假新聞（Grinberg et al., 2019）。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則指出，頻繁分享假新聞的用戶，普遍年齡較大（Shu, Wang & Liu, 2018）。該研究以分享假新聞的頻率作為用戶信任假新聞的程度，試圖探討分享假新聞與真實新聞的用戶特點。同時，較

常分享假新聞的用戶更傾向於按讚他人的貼文，體現出他們與其他用戶互動的意願較大（同上引, p. 433）。

除了頻繁分享假新聞之外，高齡者更容易被假新聞或情緒煽動性的內容吸引（Munger, Luca, Nagler & Tucker, 2020）。一項由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 State University）進行的研究指出，高齡者與非民主黨的民眾，更偏好點擊帶有釣魚式標題的連結。該研究透過調查實驗法探究閱聽人消費釣魚式標題的決定因素和影響，並刻畫消費釣魚式標題的群體特征。自媒體數位化轉型以來，大多數媒體的主要收入來自於每次點擊付費的網路廣告（clicked-based advertisements），因此媒體吸引觀眾注意力的競爭就此拉開序幕（同上引, p. 2）。該研究將釣魚式標題定義為「帶有情緒煽動性的標題，經過設計試圖以直接、明顯的方式引起讀者的某種情緒」（同上引, p. 4）。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實消費釣魚式標題會造成情感極化和對媒體信任感的降低，但對比發現，高齡者更容易受到情緒煽動性的標題吸引（Munger et al., 2020）。

針對高齡者更容易相信假訊息這一點，有學者提出反對的意見。一項分別在英國和巴西調研的研究結果顯示，年輕人比老年人更容易相信並分享在通訊軟體 WhatsApp 中流傳的有關 COVID-19 的不實訊息，說明高齡者更善於分辨資訊的準確性（Vijaykumar, Jin, Rogerson, Lu, Sharma, Maughan, Fadel, de Oliveira Costa, Pagliari & Morris, 2021）。然而，該研究同時指出，若高齡者多次接觸不實資訊，會增加相信不實訊息的機率。若對相關訊息沒有先備知識，重複的假訊息會給老年人「真相的幻覺」（同上引, p. 9）。由於此項研究只通過一則不實訊息「大蒜有治愈 COVID-19 的效力」來對受試者判斷能力進行測量，因此測量結果的有效性存疑。

佛羅里達大學的研究也指出，在判斷新聞真實性時，老年人與年輕人的偵測能力不相上下（Pehlivanoglu, Lighthall, Lin, Chi, Polk, Perez, Cahill & Ebner, 2022）。但在年齡較大的群體中，年齡與識別假新聞的能力成反比，即年齡越大，越難以識別假新聞（同上引, p. 24）。研究發現，最年長用戶（oldest-old）無法辨識出假新聞的風險，至於影響程度則取決於新聞內容所指的情境和高齡者自身的心理因素（Pehlivanoglu et al., 2022, p. 28）。該研究通過讓閱聽人分別閱覽並分析 COVID-19 相關和非 COVID-19 相關的新聞，並結合閱聽人分析推理能力（analytical

reasoning)、解讀刺激和情境後受影響的程度(affect)、閱讀新聞的頻率，來綜合比較年長者與年輕人對於新聞真實性的判斷能力。即便這項研究在對比不同年齡層的新聞判斷能力上有一定的獨創性和參考價值，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使用線上問卷的調研方式，說明該研究採用的樣本對象已經具備一定的數位素養和數位媒介的知識，不足以代表大部分的高齡者。

此外，部分有關老人與假新聞研究，則關注高齡者因假新聞而面臨的困境和威脅。以 COVID-19 為例，假新聞傳播已給閱聽人帶來實質的負面影響。截至 2022 年 9 月，COVID-19 病毒已造成六百萬以上的死亡人數，並引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與此同時，訊息傳染病(Infodemic)興起，在各大平台流傳謠言和陰謀論，進一步影響全球健康(Pian, Chi & Ma, 2021)。該研究指出，社交軟體的使用和低程度的數位健康素養(eHealth literacy)是訊息傳染病的主要成因。而分享謠言的社交行為導致用戶的心理壓力激增，傳播謠言的惡性循環是訊息傳染病的最大特點(同上引, 2021, p. 2)。

由於感染 COVID-19 病毒的 70 歲以上長者的死亡率較高，屬於高危人群，在面對 COVID-19 相關的假新聞時，高齡的閱聽人有可能進行自我參照，從而影響分析推理的過程，造成判斷錯誤(Pehlivanoglu et al., 2022, p. 29)。研究結果證實，高齡者在辨識 COVID-19 相關的假新聞時有較低的準確率，說明新聞情境會影響高齡者的分析推理能力，因而 COVID-19 的訊息傳染病會對老年人產生更大的威脅(同上引, 2022, p. 29)。

香港大學的研究證實，高齡者使用社群媒體搜尋 COVID-19 相關資訊，會產生更多的焦慮症狀及對資訊的不信任感(Wong, Liu, Leung, Zhang, Au, Kwok, Shum, Wong & Lum, 2021)。由於社群媒體流傳的資訊數量多且帶有情緒煽動性，再加上資訊不連貫、未經過核實，綜合因素加劇高齡閱聽人對於可能感染 COVID-19 的緊張和恐懼。另一方面，高齡者較非利用社群媒體進行社交活動，多是較被動地接收資訊，這樣的使用行為也會加深疫情期間的孤立感，導致焦慮(同上引, 2021)。

另一項研究分析巴西高齡群體頭痛現象的普遍性和原因，結果發現，高齡群體的頭痛普及率高達 31.7% (Santos, Frichem Bruder, Severo, Gehrke, Cavalcante & Bulgarelli, 2022)。其中，頭痛的主要成因是 COVID-19 相關資訊引起的擔憂、壓力過大、抑鬱和焦慮的症狀及精神藥品。調查進一步證實，暴露於 COVID-19 的過量

資訊和假新聞下的高齡者更易產生頭痛症狀，同時與焦慮、抑鬱和壓力過大的症狀相關（同上引, 2022）。

不僅僅是 COVID-19，有研究試圖瞭解老年人在自然災害發生時的資訊接收行為（Pang, Karanasios & Anwar, 2020）。研究發現，面臨突如其來的災害如暴風雨，由於掌握的資訊較慢且不夠具體，高齡者常見延遲反應，無法在第一時間採取應災措施，增加受災影響的風險。研究同時指出，在災害發生時，高齡者更重視所屬社群中，相關的資訊來源，對新聞機構來源的訊息更加重視。

而探究高齡者受騙於假新聞的原因，不少研究從高齡群體的心理或社會因素角度切入。其中最常見的是歸因於老年人的認知功能退化。年長者能夠憑藉知識經驗第一眼成功區分真實與虛假的標題，但隨著假訊息在網路上瘋傳，假新聞的反復出現，會提高年長者相信該新聞的機率（Brashier & Schacter, 2020 p. 317）。一項包括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等四所大學共同進行的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分析認知方式將部分解釋其相信假新聞的意願，例如有妄想傾向的人相信假新聞標題的傾向越大（Bronstein, Pennycook, Bear, Rand & Cannon, 2019）。同時，信奉教條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缺乏分析思維的個體更容易相信假新聞（同上引，2019）。

一項研究提出老年人較常分享不實訊息和假新聞的原因有媒體的複雜性，高齡者對數位媒體的不熟悉使他們無法辨認真偽；其次是記憶退化，老年人對不實訊息的抵抗力變弱；其他因素還包括個人意識型態符合和可利用性法則，意指人們可能直接根據現有的資訊來確定事情發生的機率（葉乃靜，2020）。

有研究指出，若干不實訊息具有情緒煽動和針對性極強的特質，這使得高齡者忽略在腦中重新整理儲備知識的步驟，因而接受假訊息並信以為真，從此形成錯誤的記憶（Jacoby & Rhodes, 2006）。因此，較依賴自動化處理進行認知歷程的高齡者，對假訊息更無抵抗力（同上引，2006）。

天主教魯汶大學的研究也指出，除了神經心理因素之外，情緒狀態也是高齡者更易受騙於不實訊息的原因之一（Hess, Popham, Emery & Elliott, 2012）。通過觀看呈現積極結果和消極結果的不同影片，並讓受試者填寫帶有不實訊息的問題。結果發現，老化的群體會逐漸轉化為較積極的日常情緒狀態，亦即通常老年人的情緒狀態比年輕人更積極，高齡者因此更容易相信不實訊息（同上引，2012）。亦即老人

帶有積極的情緒時，個體會減少警惕心，並有更大的機率與所獲得的資訊同化，從而更容易上當（同上引，2012）。

學者 Brashier 和 Schacter（2020）提出，老人面臨情境記憶和抽象推理等重要的能力，可能隨著年紀逐漸衰退。若重複看到某則不實訊息，對於高齡者有著強烈的說服作用，健康的高齡者甚至比阿茲海默症的患者，更容易被重複資訊說服。另一項研究也提出，高齡者相較於年輕人，需要更多努力來記住真相。若是短時間內重複向高齡者闢謠，經過三天延遲後，長輩更傾向於把謠言記成真相（Skurnik, Yoon, Park & Schwarz, 2005）。除了重複造成的錯亂，高齡者隨著年齡不斷累積常識，這些常識會幫助他們較年輕人更有能力識別明顯錯誤的資訊。但同時也會讓他們拒絕接受與他們認知相矛盾的事物，高齡者對自身記憶的極大依賴或許解釋了為何他們更輕易相信四處流傳的假新聞（Brashier & Schacter, 2020, p. 317）。

不過，該研究同時指出認知障礙（Cognitive Deficits）不足以解釋高齡者與假新聞之間的關係，分享新聞不代表閱聽人相信，高齡者散播假新聞或許是出於特定的社交目的（同上引，2020）。在失去周遭的社交關係後，高齡者會錯誤地移植他們的信任，對家人、朋友、鄰居、甚至是陌生人的信任感均提升，並且認為家人和網路上的網友分享的內容是真實的（同上引，2020）。總體來說，高齡者主要利用科技來進行社交，而不是獲得新的知識（同上引，2020）。

即便不同年齡層的群體在判斷新聞真實性的能力上相當，兩者卻可能在分享、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欺騙性內容等行為上有差異（Pehlivanoglu et al., 2022, p. 25）。有越來越多研究表明，相信假訊息不等同於分享假訊息（Pennycook & Rand, 2021）。資訊的真實與否對分享意圖的影響不大，反而是社群平台本身的情境和設置使得用戶在進行分享行為時，不再將真實性作為首要的標準。大部分的假訊息分享不是帶有惡意的動機，而是在進行分享行為時缺乏注意力，導致未辨識出虛假內容前就已經傳播不實資訊（Pennycook & Rand, 2021）。因此，為了探究高齡者與假新聞的關係，不僅要探究高齡者解讀和辨識假新聞的能力，還有其使用資訊的行為及背後的動機。

一項研究對高齡者社交軟體群組中的訊息進行內容分析，結果發現高齡者往往以直覺的方式看待謠言，不會進行內容的檢驗，也不太在乎訊息的真偽（蔡楨永，龍希文 & 林家安，2019）。即便已經掌握智慧型手機和即時通訊軟體如 Line App

的使用，高齡者仍大量轉發傳送自認為有用的資訊，以提升自己於群體的存在感，表示自己仍有能力參與社會議題和社團活動（同上引，2019, p. 58）。

一項研究調查臺灣中老年人口分享網路新聞的態度和動機（Liu, Wu & Chang, 2019）。結果顯示，中老年人分享新聞的動機從主要到次要為資訊交流、分享知識，再到社交需求，並且分享新聞的意願與新聞的真實程度成正比。其中，教育水平對於中老年人的分享行為影響較大：教育水平越高，分享知識的動機則越大（同上引，2019）。

第二節、高齡者數位落差研究

高齡者面對的「銀髮族數位落差」（grey digital divide）是假新聞有機可乘的主要原因（Brashier & Schacter, 2020）。具體表現在年齡越大的用戶越難辨別被捏造的圖像，而這些圖像通常一併搭配虛假的故事（同上引，2020, p. 320）。調查老年人的分享意願時，發現他們分享的意願普遍較低，與實際分享行為形成較大的差異，這一落差體現出高齡者對於演算法機制的陌生，並且不諳分享及轉發等網路行為代表認同的含義（同上引，2020, p. 321）。

數位落差相關研究從四個連續性的指標衡量數位落差，分別是動機、物理因素、技能及使用程度（Van Dijk, 2006）。90年代的研究重心在於材料的近用（material access），指的是數位工具和網際網路的近用，結果得出不同收入和種族的群體存在較大的材料近用性（同上引，2006, p. 224）。在材料近用的階段前，需要個體擁有電子工具並連結網路的動機，稱為動機近用（motivational access）（同上引，2006, p. 226）。技能的近用（skill access）分為三個層次，操作層面的技能是研究中最常被討論的，即操作數位設備的硬體和軟體；資訊技能則強調通過數位工具搜索、篩選、和消化網路資訊的技能；而策略性技能指的是能夠利用數位工具和網路作為完成某一特定目的的工具，並提升該使用者的社會地位（同上引，2006, p. 228）。數位媒介的實際使用是技術挪用的最終目標和階段，即使用近用（skill access）。從使用時長、應用多樣性、創意或積極地使用的方法等因素來判定（同上引，2006, p. 229）。

《2022 年台灣網路報告》提到，經由數位落差分析的調查，年齡 70 歲以上的台灣民眾的網路近用能力和網路應用服務使用能力，相對其他年齡有明顯的落差。且未上網的高齡群體不僅缺乏學習的動機，也無親友協助處理數位事務，造成與當代數位生活的極大鴻溝（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2）。

一項台灣的研究則聚焦具有一定數位能力的銀髮族進行觀察，該研究透過檢視爺爺奶奶的部落格之特殊樣貌，試圖再現其故事特質並詮釋其所傳遞之符號組織現象（蔡琰 & 臧國仁，2010）。研究結果得出，高齡者有可能像年輕人一樣透過新傳播科技組織自我經驗以建構生命故事（同上引，2010，頁 253）。並且在敘事內容中，眾多老人力求跟上新科技時代之心聲充分顯現（同上引，2010，頁 250）。

有研究指出，身心健康且有興趣學習使用電腦及網際網路之高齡者仍有可能成為新媒介使用者（蔡琰 & 臧國仁，2008）。「年齡」實非高齡者成為科技邊緣人的絕對因素，且有七成的高齡者即使對新媒介沒有相關經驗仍對電腦與網路持正向態度（同上引，2008，頁 19）。

由此可見，新傳播科技並非年輕人獨享之媒介，高齡者所面臨的不同程度的數位落差及所需的支持值得更深入地探索與解讀。

一項研究利用大數據，結合文本挖掘、搜索引擎指數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來檢視中國高齡者面臨的數位落差（Yuan & Jia, 2021）。根據中國 2022 的普查結果，中國 60 歲以上的群體超過 2.6 億人，使用網路的高齡者不到一半（同上引，2021, p. 33）。研究結果顯示，高齡者面臨的數位落差體現在各個方面，如手機使用、電子支付、QRcode、社交軟體、醫療保險等。對此，研究者提倡以相關政策來特別協助高齡者縮小數位落差，尤其是盤查 COVID-19 風險的健康碼、數位醫療保險和社群媒體的使用（同上引，2021）。

其中數位工具的近用差距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已逐漸消失，而數位技能和數位工具使用造成的落差仍舊存在且持續擴大（Van Dijk, 2006）。因此，不限於亞洲國家，歐美國家也面臨嚴峻的數位落差。一項瑞士的調查指出，2009 年約有 64% 的高齡者為離線者，即在調查時間回溯半年以來，從未使用網路的人（Friemel, 2016）。在老年人中，年齡跟網路使用的機率成反比，每增加一歲，使用網路的機率則降低 12%（同上引，2016, p. 323）。該研究指出，高齡者若得到社會網路中朋友家人的

支持，會對網路學習產生積極影響，且由社交圈內的人教導高齡者使用網路，學習效果相較公共的教育佳（同上引，2016）。

美國一項研究透過技術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來調查非網路使用者對於線上社群的參與意願（Chung, Park, Wang, Fulk & McLaughlin, 2010）。結果顯示，年齡越大的群體，對於網路的自我效能感、線上社群的品質判斷、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行為意圖就越低。高齡者與年輕群體在網路使用上仍存在代際差異，並且由於良莠不齊的線上社群和高齡群體本身缺乏信心，他們仍無法享受網路應用帶來的便利性（同上引，2010）。

高齡者的數位落差由綜合因素導致。經一項研究整理，老年人的數位落差主要源自於電子設備的高成本、不恰當的設計、以往經驗、態度、自我效能感和整體興趣偏低（Delello & McWhorter, 2017）。

當今資訊社會的基礎建設已相當完備，但高齡者並沒有隨著科技發展跟進自身的數位能力。對於學習使用數位技術，也是興致缺缺（Wang & Wu, 2021）。絕大多數老人面臨的上網困難源自於網路使用的複雜性和初學時期所要付出的大量努力，反而與經濟收入關聯性較低（Friemel, 2016）。

一項質性研究試圖從個人認知層面探究老年人使用電腦及網際網路時遇到困難的原因（Turner, Turner & De Walle, 2007）。經由論述分析發現，高齡者認知到的困難符合習得性無助的歸因理論。Nahl（1997）提出，習得性無助是一種學習網路過程中常見的現象，當使用者感知到事件不在自己掌控範圍內，則連帶著對相關的事件也失去自信心，對搜尋效率和理解指示產生負面影響。

普遍研究得出的原因有焦慮、因年齡產生的身體狀況、過於忙碌而無法學習（Turner et al., 2007）。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有異化、以過去生活經驗相悖、失去自主性（同上引，2007）。有高齡者因對電子設備及網際網路十分陌生，因此產生排斥的反應，認為「這根本不是我的世界。」（同上引，2007, p. 291）。而有高齡者強調以往的生活及學習經驗，來闡述學習新技術的困難。重申：「我曾靠與人打交道為生，而非機器。」（同上引，2007, p. 291）。還有高齡者則認為，隨著周遭的人採用科技交流的比率越來越高，因此他們非自願地進行線上的互動（同上引，2007, p. 292）。

通過對高齡者的調查發現，數位科技是賦權高齡者的工具，亦是剝奪高齡者權力的工具（Hill, Betts, Gardner & Street, 2015）。一項研究通過解釋性現象學分析檢視高齡者如何使用數位工具、使用對其幸福指數的影響及高齡者對於數位工具的態度（同上引，2015）。結果發現，高齡者體認到數位工具有助於自身福祉，消除物理和地理因素的障礙完成社交活動。但同時，若不具備相當的數位能力或不克面對科技應用的擔憂，具備豐富服務的數位工具反而加劇數位落差。擴大的數位落差會加深高齡者的社會孤立感，同時促使一些關鍵的社會或商業服務完全移至線上，讓高齡者面臨社會邊緣化的困境（同上引，2015，p. 15）。

數位落差產生的原因確實因國家的狀況而異，但許多研究者不約而同地提出針對高齡者的數位落差解方：數位媒體素養。在特定地區如芬蘭和瑞典，數位落差不再是社會經濟不平等產生的後果，而是由於數位技能的欠缺（Iskander, 2008, p. 406）。因此學者提出，培養資訊素養的教育和活動是縮減數位落差的有效工具，而非經濟方面的支援。並且為了避免高齡群體的邊緣化，這些素養教育的活動應特別涵蓋高齡群體（Iskander, 2008, p. 409）。

現況往往是，大部分的高齡者有較高的意願採用新的技術和使用電子設備如平板電腦，但是同時也擔憂缺乏清晰的指示和幫助（Vaportzis, Clausen & Gow, 2017）。針對這一現象，有研究提出解決方法：高齡者單憑數位能力不足以應對當代複雜的媒體環境，而數位媒體素養教育讓高齡閱聽人有能力驗證可疑消息並且尋求可靠的消息來源，才能有助於高齡者批判分析 COVID-19 相關資訊（Wong et al., 2021）。

接觸資訊通訊科技不僅幫助高齡者增強對抗假新聞的免疫力，還對高齡者的心理健康有積極作用（Augne, 2022）。經過研究發現，高齡者自評的數位能力水平越高，則心理和身體健康、認知能力越高。同時，是否有伴侶、教育水平和自評寫作水平是預測高齡者個體數位能力的重要指標（同上引，2022）。擁有使用電腦的技能會提升個體自我效能感，從而使得高齡者對於使用網路工具的接受度更高，形成良性的循環（Lindblom, Gregory, Wilson, Flight & Zajac, 2012）。相對的，若對於電腦使用的自我效能感很低，則對電腦使用產生的焦慮感就越重，對態度轉變無明顯影響（同上引，2012，p. 410）。

第三節、高齡者與數位媒體素養



針對數位媒體素養的概念，學界中已有不少討論。英國國家通訊辦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s）（2014）將媒體素養定義為在不同情境中，近用、瞭解與創造溝通傳播的能力，並提出重點培養網絡媒體素養（Online media literacy）——能夠自信地進行線上活動並享用其帶來的益處的能力（2017）。

然而，傳統的媒體素養已經不能滿足現今數位時代發展的需求，有學者提出新媒體素養的概念（Der-Thang, Jing, & Yu-Mei, 2011）。新媒體素養是過去幾十年所有素養的融合，如讀寫素養、視聽素養、數位素養和資訊素養。基於這個觀點，Der-Thang 等人提出的框架將新媒體素養分成兩個連續體，其一是消費媒體素養到生產媒體素養，另一指標則是功能媒體素養到批判媒體素養（同上引，2011）。而數位素養由學者 Bawden（2001）首次提出，指的是閱讀和理解超文本的技能，隨後有學者補充其內涵，將數字素養解釋為理解和使用來自各種數位來源資訊的能力（Koltay, 2011）。其中，數位媒體素養的核心能力包括：網路搜尋引擎、透過超鏈接導航、整合資訊和內容評估（同上引，2011）。

有學者提出，數位媒體素養原本是屬於電腦科學的範疇，隨著媒體素養的概念在數位情境下不斷演變，內涵也從原本的對數位技術的操作技能，拓展到更廣泛的能力，並被認為對社會融合極為重要（Wuyckens, Landry & Fastrez, 2022）。

學者林玉鵬、王維菁、陳炳宏（2020）透過檢視臺灣媒體素養政策及實行效果，表示媒體素養的意涵，隨著新媒體發展已超出原本的設定。以數位和網路發展為主軸的素養應運而生，如數位素養和資訊素養。研究中指出，臺灣作為深受假新聞和不實訊息傷害的國家，更需要針對社群媒體的結構和網路傳播的性質，推廣媒體素養來增強民眾對虛假訊息的認識（同上引，2020）。

在媒體素養衍生的許多新興概念中，後設素養（Metaliteracy）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它強調閱聽人在媒體互動中的角色，主張能夠參與、獲得、生產和分享知識的數位素養（林玉鵬等，2020）。有學者提出將後設素養的概念作為資訊素養的框架，與原本的框架內涵相比，後設素養主要新增利用數位資源進行互動協作與共享的能力（Jacobson & Mackey, 2013）。後設素養由七個要素組成：理解格式類型和發送模式、評估並積極分析用戶評價、為用戶生成內容創造情境、批判分析內容、

熟悉多媒體產製工具、理解個人隱私，信息道德和知識產權問題、在參與式環境中共享內容（同上引，2013, p. 87）。

一項研究指出，65 歲以上的老年人由於數位落差產生孤獨感、抑鬱的狀態，甚至整體健康指數大幅下滑（Delello & McWhorter, 2017）。促進資訊交流的數位工具如平板，能夠幫助高齡者增加知識、促進更加親密的家庭關係、並且與整體社會的連結更加緊密（同上引，2017, p. 22）。該研究從後設素養的角度，檢視高齡者的數位能力，結果顯示，平板相對於其他設備，有可攜帶、可容納大字體與按鈕、便於閱讀等特性，更符合高年人的需求，對減少數位落差有顯著的幫助（同上引，2017）。

在觸控平板上玩遊戲比傳統的數位工具教學方法更加有趣、吸引長者，且學習成效更好（Blazic & Blazic, 2020）。該研究通過遊戲作為教育手段，在四個歐洲國家進行實驗後得出結論，當高齡者能夠輕易上手並對該電子設備感到熟悉時，使用度就會提高。高齡者學習的不是遊戲的規則，而是如何使用電子設備而完成遊戲（同上引，2020, p. 274）。

另一項臺灣研究則以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認知資源理論（1984）為基礎，分析高齡者所擁有的資源對於他們接受新科技的影響（Wang & Wu, 2021）。該研究指出，智慧電視是幫助臺灣高齡者跨越數位落差的有效學習工具，因為有線電視是多數高齡者現有的資源，對其的熟悉度有助於他們接受數位工具並養成使用習慣（同上引，2021, p. 10）。該研究證實對工具熟悉程度與養成數位習慣的正向相關性，且肯定數位習慣有助於提升高齡者與家人的代際關係（同上引，2021, p. 7）。研究強調跨越數位落差不能單單依賴學習工具，還需要家人的支持來提升高齡者的學習動機，因而可以著重在以家庭為中心的數位解決辦法。

許多相關的研究注重技術層面上軟體和硬體應該具備對高齡者友善和方便使用的設計，提出設計的解決方案（Leonardi, Mennecozzi, Not, Pianesi & Zancanaro, 2008）。然而從高齡者的需求和面臨的情境來看，長期目標應以更加有意義的方式達成。例如針對高齡者進行數位媒體素養教育的活動或項目（Van Jaarsveld, 2020）。這些項目需要考慮高齡者群體間的差異，如在邊緣貧窮的地區，數位媒體素養則是強調保證高齡者的科技近用；而在較富裕的地區，教育目標更傾向於提高科技使用動機、提升數位技能等（同上引，2020, p. 4）。

一項研究通過調查高齡者對於電腦和科技工具的使用、學習經驗和態度後發現，對於加強或阻止電腦和科技工具使用的相關因素，對年紀不同的群體影響程度無異（Broady, Chan & Caputi, 2010）。然而年齡仍造成一些差距；高齡者在學習新技能時多仰賴過去的經驗，而數位工具於他們來說是陌生的概念，無以往經驗可供參照。因此在數位工具使用教學過程中，需要注意高齡者學習消化新知的時間充裕，且教學者始終保持積極正向的態度，讓高齡者有被重視的感覺（同上引，2010）。

在高齡者剛開始使用平板電腦時，社會支持起到關鍵的作用（Tsai, Shillair, & Cotten, 2017）。一項研究調查擁有平板電腦的高齡者的使用情況，結果得出，支持的環境對學習過程相當重要，在技術獲得和學習階段中，高齡者亟需的是初始設定和如何使用的指示（同上引，2017, p. 13）。無論高齡者的背景、技能和動機為何，並且在實際操作平板電腦後，學習動機和使用意願都會繼續提升（同上引，2017, p. 13）。

傳播學者蔡琰和臧國仁則針對臺灣兒孫輩輔助家中長輩學習電腦之情景進行調查研究（2013）。結果顯示，家中長輩與晚輩針對不同學習議題想法和需求不同，兩代群體間仍有互相學習和理解的空間。同時，高齡者對學習電腦的「正向態度」多與家庭互動情形相關，即長輩因為有晚輩教學而對電腦使用產生更大的興趣（同上引，2013，頁 104）。

並且，平板電腦這一數位工具本身，對於中老年人使用科技時提升自我效能有積極作用（Tsai, Shillair, Cotten, Winstead, & Yost, 2015）。美國針對有使用平板的高齡者進行深度訪談，結果發現，平板的易操作性能夠解決高齡者缺乏自我效能感的問題，提升連結感（connectedness），是提升數位包容性的有效方法（同上引，2015）。該研究採用社會認知理論來分析高齡者對於使用平板的態度和意願，最後證實，易於使用的特性與使用者的個人效能感有關，會進一步影響高齡者採納科技的程度（同上引，2015, p. 10）。

調查高齡者的網路使用情況後發現，較年輕的老人（the young-old）通常能夠近用網路並且有更好的數位技能，同時近用性和基本的網路技能更促進這些老年人採用新的技術（Hunsaker & Hargittai, 2018）。網路的近用和使用能力與個體的受教育

水平和經濟狀況有關，但即便如此，研究發現無論學習狀況如何，參與網路使用的培訓對老人提升網路技能有顯著的效果（同上引，2018）。

有實驗證實，數位媒體素養（Digital media literacy）能夠幫助年長者抵禦假新聞（Moore & Hancock, 2022）。該研究通過實驗驗證數位媒體素養干預的有效性，將高齡者分為兩組，在實驗前後進行新聞標題的欺騙檢測任務，作為該高齡者識別假新聞的能力。實驗組的高齡者進行共一小時的線上課程，課程內容為提升數位媒體素養能力和幫助驗證資訊可靠性的實用技巧，例如橫向思維和反向照片搜索（同上引，2022, p. 3）。實驗發現，沒有進行線上課程的高齡者，在前後測驗中僅有 2% 的正確率提升，而接受數位媒體素養教育的高齡者準確辨別出假新聞的能力從教育干預前的 64% 大幅提升到 85%，增加幅度為 21%。並且，理解數位媒體素養的老年人相比之前、以及未上課的群體更傾向於採取策略去識別不實資訊（同上引，2022, p. 4）。

為了營造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ve）的社會，美國、日本、韓國、臺灣皆有非營利組織提供數位工具使用的培訓項目及課程（Lam & Lee, 2006）。一項香港的研究展開為期一年的行為建模培訓，提升高齡者對使用數位工具的期待和自我效能感（同上引，2006）。該研究證實，他人的鼓勵有效地提升高齡者對於網路的自我效能感和學習成效的期待，這一結果與社會認知理論的假設相符，並且教學上的幫助讓學習者相信使用網路會帶來更大的效益（同上引，2006, p. 198）。自我效能感和學習成效的期許對高齡者使用網路的動機有極大的影響力，高齡者感知到技術提升越大，持續使用電子設備的機率就越高（同上引，2006, p. 202）。

以上的研究多支持，數位媒體素養的教育對於高齡者使用科技工具具有正向和鼓勵的作用，有利於減少數位落差。然而，針對高齡者的數位媒體素養教育相關的研究和理論甚少，現有的團體在執行數位素養教育時遇到不少阻礙（Hill, Beynon-Davies & Williams, 2008）。一項英國的研究深入觀摩 27 場由威爾斯議會政府贊助的全國範圍的數位媒體素養工作坊，採訪參與的高齡者並彙整有關高齡者的數位落差文獻，最後得出高齡者從事網路活動的行為和態度模型（同上引，2008）。該研究指出，在提供數位素養的支持前，應根據對科技工具的感知、文化、社會人際關係和操作技能來判斷高齡個體與網路連結的邊緣程度（marginality），再針對不同需求的高齡者提供對應的支持（同上引，2008）。支持的類型主要分為建立對網路使用

的積極態度、鼓勵對數位環境的包容文化、促進元認知學習方法，促進實際操作和使用的專業技能（同上引，2008, p. 260）。一項德國的研究以高齡者的數位素養為題，爬梳國內外採用量化和質化實證研究結果（Schäffer, 2007）。整理後發現，在量化的研究中，年齡通常是個體對網路熟悉度和數位能力的最重要指標，且結論往往落在「老年人的數位能力較低」，且其他的影響因素如社會支持、教育水平、年齡則被忽略（同上引, 2007, p. 37）。相比量化研究產出的「內隱的默認語義」，或稱之為數字偏見，質化研究則能夠隨著年齡結構的變化，找到解釋高齡群體更少接觸新媒體的原因，即研究者需要採取特定世代的定向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直接面對這一世代的影響，而不是歲數所帶來的改變（同上引, 2007, p. 38）。

本論文以假新聞為社會脈絡，瞭解臺灣高齡者在接受和使用網路資訊時的態度和行為，並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探究高齡者的數位落差情況。通過對比有無接觸數位素養教育的高齡群體。本論文嘗試釐清高齡者面臨的資訊困難，以及當今數位媒體素養工作坊的有效性。期待為日後的數位媒體素養教育帶來啟示和參考意義。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取向和方法

本論文採用質性研究取徑中的「詮釋現象學的分析方法」(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簡稱 IPA), 探討高齡者消費假新聞和數位化的經驗歷程。本論文將聚焦於有使用網路的高齡群體, 在面對網路資訊時的種種困難。詮釋現象學的分析, 目的是在獲得對於每日經驗的意義或本質的深層理解 (Smith & Fieldsend, 2021)。以現象學的方法閱讀他人的經驗描述時, 研究者面對的是受訪者與事物遭逢的存在經驗 (李維倫 & 賴憶嫻, 2009)。當研究者達到在世存有的可能性理解之際, 不再只是進行意識認識的行為, 更是一種達到與他人共同理解的過程, 稱為「現場的共同置身」(同上引, 2009, p. 284)。為了理解由經驗描述的文本需要透過詮釋現象學的方法, 以得到寓居於市的籌劃 (Project being-in-the-world), 即一種經驗者處世的規劃和可能 (李維倫, 2004)。

具體來說, 人文科學的「詮釋現象學」是對現象本質的研究, 將其自身呈現在意識之前的現象解釋, 也就是解析生活經驗 (王瑞堦, 2002)。「詮釋現象學」從日常生活的許多語言對話、文本等, 取得觀察現象的資料, 再透過訪談和經驗蒐集結合, 通過其他人的經驗與對經驗的反省觀點, 反思人類生活經驗的意義 (同上引, 2002, p. 80)。

因此, 本論文透過詮釋現象學的質化研究取徑, 擬採用具體的質化研究方法, 深入瞭解高齡者的數位科技相關的生活經驗, 及接受現有數位素養教育的經驗, 來反思高齡者數位素養教育的需求和未來方向。

本論文從高齡者消費網路資訊的情境切入, 主要聚焦在高齡者在社交媒體 Line 上消費健康資訊時的情景。圍繞健康資訊展開研究, 一方面是因為高齡者對此類的資訊關注度高, 必然會有豐富的資訊經驗。另一方面是透過高齡者的經驗, 才能進一步理解高齡者面對健康資訊時的傳播行為。

研究方法上，本論文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相關研究資料，再就訪談內容進行分析與探究。



第二節、半結構深度訪談

本論文擬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利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交談，進行意見交換與建構。研究者藉由訪談的過程與內容，收集與分析受訪者的動機、信念、態度、作法與看法（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王婷玉譯，1998）。深度訪談訪談形式區分，主要分為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訪談（*focused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或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以及群體訪談（*group interviews*）（Williams, 1997）。其中，半結構式訪談主要是研究者利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作為訪談依據，部分訪談問題會在訪談前設計出來，作為訪談的基本架構（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在深度訪談過程中，問題的形式或討論方式則採取較彈性的方式進行，可因此獲得受訪者更真實的回應（同上引，2005）。由於高齡者接觸傳播科技的經驗較多元，本論文將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進行。

本論文擬與有使用網路的高齡者進行個別深度訪談。本論文擬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探究高齡者對使用數位工具的詮釋角度和自我效能感。本研究同時擬訪問 Mygopen 和假新聞清潔劑組織中從事高齡者媒體素養工作的人員，作為高齡者數位化情境的補充說明。

第三節、研究對象

高齡者的定義通常是以時序年齡劃分，國際慣例將 60 歲以上或 65 歲以上的人口歸為老年人口進行統計，臺灣人口統計老年數據多以 65 歲為準。不過「時序年齡」並非辨識老人的絕對指標（蔡琰 & 臧國仁，2010）。「社會年齡」，即指個體扮演的社會角色年限，亦可作為「老人」的標準，因為社會角色的變化及自我形象才影響高齡者對自身年齡的認知。本論文因此將符合屆齡退休或已擔任祖父母者，均視為「高齡者」（蔡琰 & 臧國仁，2008）。

有關研究對象及招募，本論文的研究對象需滿足以下條件：（1）符合屆齡退休或已擔任祖父母階級者；（2）使用至少一種數位工具以消費新聞。本研究透過隨機方式，於新北市某社區閱覽室中，認識並尋找願意參與研究的高齡者，並且約定時間與他們進行訪談。其後，本論文使用滾雪球法（Snowball），請已經受訪的高齡者推薦符合資格的高齡者接受訪談。透過他們的述說，幫助理解高齡者網路參與的經驗與意義。以下針對受訪者的資料和背景加以說明。本研究共訪談 17 名受訪者。

表 3-1 高齡受訪者資料

個案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採訪時間
1	A	男	80	2023/2/13
2	B	女	63	2023/3/2
3	C	女	72	2023/3/2
4	D	男	73	2023/3/6
5	E	男	59	2023/3/16
6	F	女	68	2023/3/22
7	G	男	71	2023/3/22
8	H	女	62	2023/4/6
9	I	男	68	2023/4/8
10	J	男	73	2023/4/9
11	K	女	65	2023/4/10
12	L	女	74	2023/4/10
13	M	男	72	2023/4/12
14	N	男	64	2023/4/13
15	O	女	76	2023/4/14
16	P	男	72	2023/4/15
17	Q	女	66	2023/4/15

表 3-2 媒體素養教育工作者受訪者資料

序號	受訪者	單位	採訪時間
1	葉子揚	MyGoPen	2023
2	慕慕	假新聞清潔劑	2023/1/3



第四節、資料搜集

研究者在社區閱覽室等場域隨機尋找符合研究條件的受訪者，取得採訪同意之後，立即進行採訪。受訪者原則上進行一次訪談，另有部分受訪者因需要進行第二次的補訪。每次訪談約持續一至兩小時。每次訪談前，研究者會告知受訪者將進行錄音，取得同意之後方得以測錄訪談。

為分析與整理訪談結果，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即謄錄錄音檔為逐字稿，進行文本分析。研究者在訪談中再三確認，以釐清訪談中發生的事件（余德慧，2004）。文本將訪談過程以文字的方式保留，對於訪談歷程的理解也是研究者詮釋文本所談到的課題的資源（方格正 & 李佩怡，2016）。

從高齡者、教育者和教學現場中，彙整三方資料詮釋並分析現象。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擬訪談問題如下：

1. 高齡者的訪談大綱

- (1) 平常從哪裡獲得健康資訊類的新聞？最近看到印象深刻的新聞為何？
- (2) 收到資訊是否會分享？分享給誰？會收到來自親朋好友的哪些訊息？
- (3) 有沒有聽聞過假新聞的經驗？造成什麼影響？
- (4) 若對新聞的真實性存疑，會怎麼做？如何查證？
- (5) 家裡有使用哪些電子產品？用途和使用頻率？
- (6) 電腦或網路能協助你做哪些事情？最喜歡使用哪些功能？想要學習什麼新功能？
- (7) 若是遇到使用上的問題，會怎麼做？向誰尋求幫助？

2. 數位媒體素養教育者的訪談大綱

- (1) 教學的內容為何？教學前後高齡者有哪些改變？
- (2) 在學習中，高齡者有什麼訴求？使用數位工具的動機為何？

(3) 學習中，高齡者遇到常見困難點有哪些？需要通過什麼樣的協助才能克服？



第四章、研究發現



本論文採用深度訪談法，分析高齡者的網路參與歷程與動機，進一步了解自我效能感在高齡者使用網路的情境中扮演的角色。本論文試圖系統性呈現受訪者的談話內容，包括對網路使用情境、社交生活滿意度、對電子產品看法、網路新聞及訊息的看法，以及個案在受訪過程中曾提及的相關決策因素。為了解自我效能感在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便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沒有主動提及，研究者仍根據訪談內容評估受訪者的自我效能感程度後一併列入分析。以下為本論文主要訪言談之間內容與發現。

第一節、高齡者追求網路互動更多於接收訊息

高齡者利用網路傳播資訊，背後更在意的是維繫社會關係和強調網路存在感。假訊息藉由高齡者相互關心作為網路互動的動機，而得以肆虐。對高齡者而言，網路傳播的實質意義，往往超越了資訊本身，更多的是在於透過這種方式維繫社會關係，以強化他們在網路世界的存在感。正因為這樣的動機，假訊息才有機會在高齡者間大肆傳播。

具體來說，「每天早上傳送早安圖」便是一種明顯的表現方式。這種行為，儘管其本身沒有實質的內容，卻成為幾乎每個高齡者都會接收或執行的「儀式」。這體現他們對於網路社交的重視，卻在無形中為假訊息的傳播提供了土壤。

本論文從早安圖的資訊行為切入，發現受訪的高齡者會傳送或接收到數則早安圖，少則十幾條，多則上百條。對早安圖抱有積極態度的高齡者認為，這是有人情味的人際互動，也會將早安圖的傳送作為每日必做的事項。事實查核團體 MyGoPen 的創辦人葉子揚在訪談中提及：

MyGoPen 的使用者為高齡者居多，使用電子產品是高齡者維繫人與人之間連結的一種方式，以證明他們還活躍於社會活動中。因此，在社群媒體

Line 的使用時，高齡者相當在意「已讀」和「回覆」，例行的早安圖成為部分高齡者傳達「我仍健在」的訊息。因此，傳遞訊息的動作本身很重要，傳遞的內容為何則是關注的其次。



在網路使用習慣的多樣性中，不同的高齡者對於社交媒體上常見的「早安圖」有不同的態度和看法。這些具有簡單問候或祝福語的圖片，對某些高齡者而言，是一種友善的社交慣例，且可能帶來積極的情緒反饋。72 歲的 C 認為早安圖是獨居老人必須要發的訊息，作為「報備」：「獨居老人應該要發，他發了他朋友才知道他今天是安全的。要不然死在裡面都沒人知道。」

76 歲的受訪者 O 則認為每天的早安問候，可以傳遞溫馨的感覺。並且她會根據接受者，選擇不一樣的圖片內容。O 說：

我會找適合的來傳。我一打字就會跳出早安圖的貼圖，我會選擇喜歡的。

我看那些圖案很溫馨的，我就會傳出去。看別人傳來很有感覺的，我也會傳。如果年輕人的，我會傳比較可愛的；如果是老年人，我都傳風景的。

受訪者 G 對早安圖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大家都在傳早安圖，便是網路流行。每日傳送早安圖的高齡者，多半展現他們對於網路互動和社交的渴望。除了早安圖之外，只是例行「打招呼」，並未與訊息接收者有更多的互動。G 說：

大部分都是 line 個早安，現在最流行。偶爾也會用早安圖、或者傳文字。

平常每天早上就是早安，沒事情就是早安。其實大家很少聊天。

受訪者 L 則將早安圖作為一種個性的展現，不僅會挑選好看的圖片進行轉傳，更是會自行拍攝、編輯圖片，自製早安圖。L 表示：

朋友傳的，我覺得好的我就傳給別人。或者我自己上山下海，我覺得好

看，我就自己做早安圖。我會用美圖秀秀！就寫上一些字說：早安啊、歐

哈噶啊（韓文）。都是我自己拍的。



除了積極的態度之外，也有部分高齡者則認為這類訊息是無意義、且浪費時間。例如，受訪者 I 就表示他對於每天收到的早安圖感到困擾。I 說：

天天收到早安圖。傳來傳去，我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不回不好意思，回了又覺得怪怪。

這種情況反映出一種社交壓力，使得高齡者雖然不願接收這些訊息，又因為禮貌或關係維繫的需要，而必須回應。另一名受訪者 H 則更直接地表達了他對早安圖的不滿：

我不太喜歡早安圖，好浪費時間。每一個都會回，太久了。除非這個人每天都傳給我，我偶爾在特別的日子會回一個。

H 提到，早安圖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且未為她提供足夠的價值或滿足。六十五歲的受訪者 K 十分反對早安圖，認為過多資訊造成浪費時間。但同時，她仍會關注特定對象是否有傳送早安圖，才會安心。K 表示：

超討厭的。別人傳給我我都直接不回。很煩欸，真的很多。我的群組就有人傳，我都當作沒看到。我以前上班都不回，我姊姊也會傳給我，我會看啦。心態是保平安的感覺。我的姐姐平常六、七點都傳了，昨天八點還沒傳。我就有點問號這樣，後來傳了，我就會比較安心。已讀不回，還是會讀啦。

受訪者 Q 本來就不愛在社群平台上有過多的互動，她直接無視並刪除早安圖的互動，認為是不必要的。Q 說：

傳早安的，我都直接刪除。如果我會回的，就兩三位，這兩位可能覺得要應酬一下。其他我直接刪掉，就不讀不回。減少我的用量，不想太花時間，我就直接刪掉對話框，不會點進去。工作相關的會看一下。

對早安圖持負面態度的高齡者們認為，社群平台上的「早安圖」在訊息傳播的過程中，多數是由一個群體傳送給另一個群體，或是一個人一次發送給多數人。對於這種群體間、一對多的資訊交流，部分高齡者感到這種模式過於無意義，且失去了原有的情感聯繫與人情味。他們認為，當這種「早安圖」訊息僅直接傳送給個人時，可能才會有相對的價值，值得回覆或是交流。

這種觀察顯示出，即便在數位社會中，高齡者仍然重視傳統的人際交流模式，並期待透過網路進行更具有人情味的互動。M 就表示，他僅僅回覆個人傳送的早安圖，並以文字形式回覆。M 說：

早安圖就不用回了。早安圖都是群組裏面，傳給一大堆人，那個沒必要回。如果是傳給我個人，我可能會回，就回一個早安。

綜合以上，高齡者對於「早安圖」這種社交媒體上的通用慣例，其實有著複雜而多元的觀感。這不僅反映出高齡者在面對網路社交時的差異性，也揭示出他們對於網路使用的主觀詮釋與期待。

由於有些高齡者更加渴望有實質內容和深度的互動，某種程度上也為假新聞的傳播提供了機會。他們期望的是人際間的交流，而非知道更多訊息，因此對於內容真假較不在意。這也意味著，網路上的假新聞更可能像一般訊息，為高齡者接收。

第二節、人情因素加速資訊傳播

除了以早安圖報備「健康狀況」外，傳遞健康相關的資訊更是高齡者用於表達關心的方式。這使得許多假訊息利用高齡者對身體健康的注意力，傳播危言聳聽的內容。以「好心提醒」與「關心健康」作為包裝，健康類的假訊息得以在高齡人的人際網路中傳播迅速。MyGoPen 的創辦人葉子揚在訪談中表示，根據該平台的統計，養生、保健、政策交通類及與老年群體相關的福利政策均是謠言和詐騙最常出現的主題。

76 歲的 O 受訪者收到數不勝數的健康類資訊，她認為無法樣樣皆做到，則選擇性地挑選可行的方案。可見，她收到相關訊息時，以身體健康的考量點出發，會認真考慮食補健康的可能性。O 受訪者說：

有很多！我都不看，我不去看這類的資訊。我飯都來不及吃了，我沒時間去吃那個東西。我對那個沒興趣。我認為我們想吃什麼，就來吃，有營養就好。不會特別覺得要吃什麼。要看個人，健康食品感覺要吃很多。



62 歲的 H，表示朋友出於關心，轉傳和分享非常多保健類的資訊給她。這給她造成困擾，浪費時間且資訊沒有幫助。H 受訪者說：

很多啊，朋友好心都會傳一些健康類的資訊。剛開始會關注，但是後來不會，覺得太多這種東西。十大食物可以瘦身、可以怎樣，那些都是要靠自己，我覺得沒什麼用。我覺得很多訊息，訊息太多了，沒那麼多時間可以看這些。

對於高齡者而言，健康資訊的可信度和實用性尤為重要。然而，在當前的社交媒體環境中，特別是在 Line 這種即時通訊平台上，虛假的健康資訊層出不窮。儘管高齡者已意識到其中問題，卻仍然可能關注這些資訊，因為這是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更重要的是，由於這些資訊與生活緊密相連，他們更有可能對這些資訊採取盲從的態度。

80 歲的男性受訪者 A 提到：「當然會注意（健康資訊）！健康這個東西，到我們這個年紀都是會注意。」63 歲的女性受訪者 B 也提到，Line 上關於健康飲食、運動操等的小文章相當多。本身沒有查證資訊的習慣。B 若瀏覽到認為有幫助的內容，會傳到姐妹群組共享資訊。他認為共享資訊意不在內容，而是心意。因此，經由好朋友認證而傳送給自己的訊息，高齡者不僅會疏於查證，還會因親友的「善意」而更傾向於接受。B 說：「資訊都是朋友傳給我的比較多，有看到不錯的，朋友都傳給我。有些我看了也覺得不錯。」

對於「有爭議的」健康議題，些許高齡者會保持高度的關注，並會依據各種來源進行判斷。例如受訪者 J 就分享了他對於「爬樓梯是否有益健康」這個議題的看

法。他曾看到一些認為爬樓梯對膝蓋不好的網路內容，然而，近期他又看到新的理論認為爬樓梯對身體有益。在這種情況下，楊先生基於新聞來源的判斷，暫且選擇相信後者。J 受訪者說：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臺大的教授說爬山、爬樓梯會造成骨頭傷害，這是錯誤的。其實是幫助你復健，幫助你好。他只有說如果你很久沒運動，要慢慢來，不要去硬做，這樣會造成膝關節受損。平常有在運動的人，爬山走樓梯都是好事。之前不是有的人說有電梯不要爬樓梯。但我還是會再去 Google 看看啦。

這樣的例子揭示出，面對數位資訊的海洋，高齡者不僅需要判斷訊息的真偽，而且要能處理不一致或是顛覆性的訊息。當新的理論和他們的既有認知產生衝突時，如何基於權威來源與科學證據，去接受並整合這些新的資訊，是他們在數位素養教育中需要提升的能力。

例如，受訪者 M 提出類似的觀點，經由簡單程度和可行程度進行十分粗略的判斷，M 會遵循一些健康資訊的「指示」來保持身體健康。受訪者 M 說：

一大堆啊，每天都有。就是參考看看，自己判斷真的假的，覺得有用的話就去做，大部分都覺得很離譜啦。譬如說，做運動什麼的，眼睛操啊什麼的。比如說太麻煩的話，我看看就過去了。簡單的話，我可以做的話就會做。有一個健身操，什麼活動到腳，我覺得那個動作對身體蠻好的，我每天都有做，每天五十下。有些運動不是很複雜，我感覺對身體有效的，我就會去做。

這段話揭示高齡者在面對 Line 上健康資訊時的選擇性關注和判斷邏輯。即使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些資訊可能不真實，但是由於健康是生活重心，他們仍然會選擇去試驗這些方法，特別是那些簡單易行的方法。可見，即使在偽健康資訊充斥的情況下，高齡者依然能透過自我篩選，找出他們認為有價值且可行的建議。如何幫助高

齡者辨識真實與虛假的健康資訊，以確保他們不會因誤信錯誤的健康建議，而傷害自己的健康，是數位素養教育的挑戰。

在媒體環境中，不止虛假訊息能引起高齡者的疑慮，聳人聽聞和故意製造惡意聯想的訊息亦可能引發他們的恐慌。尤其當這些訊息與他們的身體症狀相關時，更能引起他們的高度關注。對於已對自身健康深感擔憂的高齡者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在新冠疫苗的相關訊息在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她也因此感到困擾。受訪者 F 說：

疫苗的資訊當然有聽說啊！很多人會說打了會死掉什麼的。但有的事情打了疫苗沒打疫苗，會發生就發生。有可能是自己身體的關係，本來就免疫力比較弱。我也不會說很緊張，但就是很難過。

對於那些容易產生恐慌的訊息，高齡者需要更多的判斷力來辨識真偽，並且避免影響自身的情緒和健康狀況。除了健康資訊之外，福利政策也是高齡者十分關注的議題，廣泛地被轉傳和分享。

然而，由於這些議題的複雜性和討論度高，以及高齡者可能缺乏相關的知識和資源來確認訊息的真實性，他們往往會陷入困境，無法確定訊息的真偽。M 提及：

因為沒辦法確認一定是假的，比如說政府發什麼錢，退健保費什麼的，要你去申請。我一看就覺得可能是假的，但就覺得可能而已。

在數位媒體素養教育中，不僅需要提升高齡者對於健康訊息的判讀能力，同時也需要增強他們對如政策福利等公共議題和訊息的批判思考能力。高齡者需要學習分辨和驗證這些訊息的真偽，從而避免被錯誤或假的訊息所誤導。

在面對大量的數位資訊，有些高齡者採取了「參考」的態度，即並不完全相信他們在網路上看到的訊息。這種保守的態度，雖可能有助於他們一時間不被假訊息誤導。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參考」的訊息，也可能會不自覺地變成他們的「真相」，因為他們可能忘記了這些資訊原本只是作為參考的來源，而非經過確證的事實。受訪者 K 提出：

那個在 FB 看到的，那些資訊我會稍微點一下，會看。正確性有問題？對！
但是我就是看一下，參考，不會真的相信。有些寫的太浮誇的，我也不會
相信。



高齡者不僅需要能夠判斷訊息的真偽，也需要具備在面對大量數位資訊時，能夠即時、準確地決策的能力。這種能力包括如何快速篩選訊息，如何判斷哪些訊息值得進一步探索或是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如何將這些訊息轉化為自己的知識和理解。

第三節、高齡者重視人際關係，可能妨礙虛假訊息查核

除特定資訊互動與分享之外，高齡者往往更在乎的是互動的回應，而非訊息內容本身。這是由於他們將網路訊息的傳遞視為一種社交行為，並以此來評估彼此間的關係親疏。延續前述早安圖研究，高齡者非常重視人際關係。以致他們傾向於接受並回應收到的訊息，因為他們更重視與他人的互動而非訊息的真實性。

本論文訪談發現，高齡者的回應可歸納為三種不同情形。首先，他們收到訊息後，往往不會質疑訊息的內容是否有真假問題。第二，即使他們對某些訊息有疑慮，他們也傾向於不公開提出，以免影響與訊息傳遞者的關係。第三，即使他們選擇提出質疑，因此導致與訊息傳遞者的關係受損，他們可能會感到不快。因此，他們會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避免直接質疑或批評收到的訊息，以維護人際關係。

以六十四歲的男性受訪者 N 為例，他明確表示：

一般來說，如果我傳過去，對方幾次沒有回，我就不會再傳過去了。這是一種互動嘛。我看到人家傳給我，我都會回一下，禮尚往來的感覺。如果沒有那麼熱絡的話，那就算了。

此語意味著對 N 來說，回應的存在與否，成為了他評估對方是否欣賞、甚至是否仍想維持這種社交關係的重要標準。這個現象意指，對於高齡者來說，網路溝通的目的並不僅僅是傳遞訊息，更是一種展現社交禮節、維繫人際關係的方式。

對於高齡者來說，他們的網路互動方式揭露了一種人性化、情感導向的特性。在傳遞網路訊息的過程中，他們更在意的是這些訊息能夠帶給接收者怎樣的感受，是否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甚至是否能夠使他們感受到溫暖與關懷。以 P 為例，他對於分享訊息的策略顯然充分考慮接受者的感受。P 表示：

看到好的一定要分享。都是簡短的，長的不會分享，因為也沒有人要看啦。我每次分享都會一則，或者兩則，最多一天三則。太多了人家不看，一看到那麼多就不看了。大部分都會傳很多人，還會分男女，有的男的不能傳，有的女的不能傳。還會分藍綠，藍的可以傳，綠的不會傳。我會認真篩選。

因此，可以看到高齡者對於網路溝通的理解和實踐，並不只是單一層次的信息傳遞，而是一種深層次的情感連結和社交維護。不僅僅是更願意相信親友的「關心」，高齡者若自身身體微恙，也會對相關的養生及保健資訊特別敏感，因此降低資訊正確性的判斷能力。高齡者其實不會主動尋求健康養生等資訊，而是被動地接收，這也是造成假訊息泛濫成災的原因。當高齡者只受限於社群軟體 Line 上的資訊，無法閱聽到多元的資訊和不同意見，因而也會相信唯一的資訊來源。

對於來自親友的訊息，高齡者經常表現出較高的信任度，尤其當訊息與自身健康狀況相關時。然而，這種信任可能導致偽造訊息的擴散。另一方面，社交禮儀與避免破壞人際關係的顧慮使得他們在處理假訊息時，傾向於保持沉默。

當被問及是否會直接與朋友關謠，受訪者 H 回答：

不會，不好意思。很多是假的，除非在群組裡面，很明顯是假的東西，我才會表明這可能是詐騙或假訊息。但若我不確定，我通常不會採取行動。

H 的回應顯示了高齡者在應對假訊息時的困境：他們需要平衡避免受到錯誤信息影響與維護人際和諧的需求。I 同樣表示，當他收到朋友傳來的健康保健訊息時，他選擇不去回應或反駁，以避免尷尬或衝突。她說：

我不理他。我也不反駁他，就看看就好了。也不好意思說你不要傳。line 上面就看一看，就無所謂啊。我不知道怎麼回，就不回就好了。



I 的回答揭示了高齡者在應對可能的假訊息時所選擇的策略，這種策略實不利於假訊息的辨識和防範。由於高齡者可能會為維持人際和諧，而忽視對假訊息的抵制，這將持續助長假訊息的流傳。

在高齡者對於網路資訊鑑別的技能相對較弱的情況下，更容易成為假訊息的傳播者。然而，一旦發現自己不小心傳播了假訊息，他們的反應常常是強烈的羞愧和自責。七十二歲的 P 表示：

沒面子啊，丟臉了。表示看得太少了，其實假訊息都是重複的。人家早就知道了，我還不知道，還把這個當新聞，丟臉啊。我就會回覆說，氣死了又被騙。所以現在如果有一點懷疑，我就不會傳了，就在我這邊結束了。私訊的時候，我可能會問一下，但是在群組裡我就不會了。

他的話語中可以感受到他的焦慮和自我責備。在這種情況下，他將更加謹慎地對待所接收的網路訊息，並在懷疑其真實性的時候選擇不去傳播。儘管高齡者可能在資訊鑑別的能力上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他們對於自身行為的正確性和社群內的形象維護同樣重視。因此，提升他們的網路資訊素養，特別是在鑑別假訊息的技巧上，對於他們的網路使用經驗將會有顯著的改善作用。

這些例子都顯示出，人際關係在高齡者應對假訊息時扮演了關鍵角色，影響他們的防範能力和處理策略。總的來說，親朋好友的影響對健康資訊的關注度降低了高齡者對假訊息的防範能力，且他們在面對假訊息時，可能由於各種原因選擇保持沉默，使得有害訊息得以不斷傳播。

第四節、高齡者對數位機制感到陌生，影響假訊息即時澄清

高齡者的數位媒體素養仍然面臨重要的挑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並未有足夠的教育資源和體制，特別針對高齡者進行網路的基本操作與原理的啟蒙教育。

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高齡者身處學習新技術的邊緣，進而導致他們面對網路這個陌生世界時，充滿擔憂與恐懼。在面對混雜的資訊世界，高齡者不僅容易陷入標題陷阱，更是不知道如何查證。即便擁有查證的意識，高齡者也只能透過 Google 查詢進行簡單的二次驗證，而對於 Google 上的內容毫無警惕。MyGoPen 的創辦人葉子揚認為，年長的高齡者對於社群平台仍十分陌生，因此更難以抵擋假訊息的傷害。葉子揚說：

年長的高齡者對於操作手機和社群平台 Line 的機制不夠瞭解，就會錯誤認為網路流傳的資訊均為真實的內容，沒有網路謠言的概念。P 圖、演算法和內容農場等概念，對於初步接觸電子產品的高齡者來說，更是陌生的概念。學習基本功能就已經困難重重，更別論瞭解網路世界的複雜機制和技術遭濫用的弊端。

對於網路世界十分陌生的高齡者，對新的功能會感到卻步。L 即便 20 年前已開始使用電腦和手機與親友聯絡，卻始終不會下載應用程式和網購，擔心自己受到詐騙。L 受訪者說：

以前那個寶可夢什麼的，我都不知道，sunny (孫女) 爸爸叫他們幫我下載，我都不敢下載。我怕下載弄錯了什麼的。或者買東西，我怕我老糊塗，個資洩漏或者花費七、八萬什麼的，我女兒兒子他們會擔心。我會跟 sunny 媽媽說，我要買什麼，她都直接幫我買。我陌生的電話也不會接，詐騙集團那麼多，新聞也會報這些案例。

對未知的恐懼和擔憂，不僅阻礙了高齡者接觸並掌握新的數位工具，也間接影響他們接受數位的媒體素養。L 的例子便是一個具體的反映。她提到：

還好啦，就是不敢下載。下載很麻煩，還要網址啦什麼的，有的又是英文，我都不會用。錯了就糟糕了。

對於 L 來說，未知的網路環境和操作的挑戰性，讓她在遇到數位問題時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傾向於避免對新事物的嘗試。因此，無論是從個體或是社會層面來看，都需要提供更多針對高齡者的數位教育資源和措施，以期降低他們對新科技的懼怕和疑慮，讓他們能夠更好地適應數位化的世界。

同時，高齡者也面臨「資訊爆炸」的困擾。數位受訪的高齡者均提到，日常群組裡的資訊太多而無法消化。有的老人會選擇性地篩選訊息，例如只觀看影音訊息；有的老人則選擇僅看自己關注的議題來看。在資訊爆棚的網路生活中，高齡者要花費相當多的精力篩選、尋找和消化不同的資訊，從而無力關注資訊的正確性。由於資訊過多，重複出現的資訊意味著該資訊得到更多親友「認證」，從而讓高齡者更願意相信流傳廣泛的資訊。

對於高齡者而言，網路上的資訊真偽判斷有時並不易確定。如 73 歲的男性受訪者 D 所言，他認為只有反覆出現的資訊才較具有可信度，他解釋道：「很多人傳的話，真實的機率會大一點，我就會注意一下。」然而，這種看法並無根據，還可能讓 D 更容易受到網路假訊息的影響。因為假訊息通常會在網路上大量且反覆地流傳，反而可能讓老人將廣為流傳的假訊息，誤認為是高可信度的資訊。

D 受訪者的資訊評估方式，揭示了一種普遍的認知偏誤——即「頻率偏誤」。在對特定事件沒有具備任何儲備知識或先前基礎認識的情況下，高齡者往往認為某一件事情越常見、或越常被提及，越有可能被認為是真的（Brashier & Schacter, 2020）。有研究指出，若高齡者對特定事件沒有先備知識供判斷，那麼重複闢謠反而會加大錯誤論述的效應，形成「真相的錯覺」（Brashier, Umanath, Cabeza, & Marsh, 2017）。這種偏誤可能為高齡者的資訊圈帶來嚴重的傷害。假訊息的製造者和散播者常常會利用這種認知偏誤，以提高假訊息的可信度和影響力。高齡者每日暴露在社群平台中眾多假訊息中，若遇到較不瞭解的議題，極有可能陷入假訊息的圈套。

因此，依賴於資訊出現頻率來判斷其可信度的方式，導致高齡者容易受到假訊息的誤導。在他們的資訊環境中，假訊息的流傳可能造成的影響性和傷害性相對較大。換言之，正確理解和評估資訊真實性的能力對於防範假訊息來說，對高齡者是亟需提升的能力。

以社交互動為主要目的高齡者，共同形成高密度的特有的資訊圈。這讓高齡者在數位時代中面對更嚴峻的挑戰，同時也使得部分高齡者對假訊息具備較多的認識和防禦。高齡者的好奇心及對網路的正向態度可能意外地增加其接觸假訊息的風險。他們似乎較為傾向點擊具吸引力或引起疑惑的標題，進而提升暴露於虛假資訊的機率。受訪者 J 在描述自己的網路使用習慣時表示：

臉書 YouTube 等平台常有連結。一些新聞標題很聳動，就會點進去看一下。新聞的標題都讓你看不懂！讓你好奇，要進去挖一挖看一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點進去原來是一個簡單的事情，標題就是引誘你點擊該連結，進去後廣告先出現，還要先把廣告點掉。

受訪者 K 的想法也與受訪者 J 此相似：

推播的新聞有興趣的我就會點開。直接滑下去看。推播通知這些即時新聞，我每天都會看。手機有時會跳出標題，我就會看一下。在 FB 看到的健康資訊我會稍微點一下。

Q 已經很少使用臉書，但會根據標題的吸引力程度選擇是否要開啟應用程式。她說：

有時候會跳通知，如果我看到我喜歡的標題我會看，基本上很少。我會看政治類的，按讚一年不超過十次，我會看韓國瑜的那些貼文，可能會看到有些會留言。

三名受名訪者的經驗都凸顯高齡者在面對資訊時可能的風險。由好奇心引發的「點擊行為」，可能無意間增加他們接觸假訊息的風險。因此，對於高齡者而言，除了增進數位技能與辨識假訊息的能力之外，也應提升他們對網路資訊批判思考與審慎處理的意識。

另外，不少高齡者常以「基本常識」來判斷網路流傳的資訊。少數老人會使用簡易的查證的方式，即使用 Google 查詢是否該消息有其他的消息來源，作為證實消息真假的佐證。受訪者 B 表示，遇到醫藥類的資訊，若真的符合自己的需求，則會更謹慎看待資訊：

我會真的去食補。或者去看醫生，醫生一定知道啊，或者糖尿病的要注意的飲食，我都會上 Google 去查，我覺得現在 Google 很方便。

另一名 62 歲的受訪者 H 也具有相似的見解，她強調若是 Google 上有相同的內容，她便不再懷疑內容的真實性。H 說：

我以前比較不會看，但後來發現很多都是假的東西，我現在都會在 Google 上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詐騙還是謠傳，上網查一下，如果有人說這是謠傳，我就會相信。

受訪者 B、H 不僅具有識別可能為假訊息的直覺，還能採取了主動的步驟去驗證這些訊息的真實性，如進行網路查詢。這顯示，長時間的網路使用經驗，使得 H 等高齡者能夠有效地辨識並抵禦假訊息的侵害。

然而，Google 上也有各式假訊息，高齡者還是需要有一定的警覺。在網路社群平台上，各種資訊的流傳快速而廣泛。對於這些資訊，高齡者漸漸因經驗而抱持著一種懷疑的態度。然而，他們在查證這些資訊的能力與手段上，卻十分受限。一般而言，他們的查證手段大多侷限於使用 Google 進行搜尋，並且他們往往缺乏對 Google 搜尋結果的批判性思考和篩選。只要 Google 的搜尋結果中出現與該訊息相似的內容，他們就可能認定該訊息為真實的。這種情況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在當前的數位環境中，許多高齡者對於網路資訊的辨識與查證能力仍遠遠不足應對冗雜的網路資訊。

第五節、高齡者逐步學習尋求親友、專家查證與闢謠

有些使用經驗較豐富的長輩，認為假訊息的「馬腳」往往有跡可循。例如，看到標題十分誇張、聳動的內容，部分高齡者已有警覺此為假訊息。藉由以往上當受騙的經驗，高齡者才逐步學會辨認假訊息，而非是對網路資訊先抱持警覺。長期的網路使用經驗使一些高齡者能夠更清楚地識別出假訊息的特徵。

隨著他們對網路資訊越來越熟悉，他們的警覺性逐漸提高，可以更快地從訊息的表象，如誇張的標題或極端的立場，中看出其可能的虛偽性。

八十歲的 A 表示：

不看啊，有的標題一看就是假的。我都是先看標題，再看內容。標題很誇張，有的就是內容和標題一點關係都沒有。比如說之前看的，就是吸引你點進去，結果跟標題完全無關。

六十八歲的 F 受訪者則表示，他已接收過無數「一傳十、十傳百」的謠言，根據假訊息的聳動及奪人眼球的設計，在判斷真偽時要注意字句的煽動程度。他說：「要判斷什麼事情，要先想一下有沒有可能。如果你就先產生共鳴，就很容易綁在一起。」

以上例子表明，豐富的網路使用經驗能夠讓高齡者在面對網路假訊息時，有更多的資源和能力去進行辨識與防範。儘管他們在初期可能存在一些困惑和挑戰，但隨著經驗的累積，他們的辨識能力和警覺性都有所提高。

然而，光憑使用經驗仍難以辨識出經過刻意設計的謠言，有些老人則通過跨同溫層的分層取得關謠的結果。不少長輩會將不確定的資訊分享給子女或是較親密的友人，希望藉此得知資訊的真假和他們對資訊的看法。高齡者得到該資訊的負面評價，從而對社群平台上的資訊均有所警戒。

受訪者 A 表示家人若收到假訊息，會進行關謠，也會指責他傳播假訊息的行為。他說：

我以前也會傳給我女兒，她後來都罵我，這都是什麼東西，亂傳的。有些自己發明的，什麼打這個部位血壓降低。以前我會相信。現在不相信了。

我女兒都會說我，這都是假的，怎麼亂傳一通。但我也是好心傳給她的。

她也不知道從哪裡知道（是假）的。



對於高齡者來說，查證網路上的資訊可能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不具備足夠的技能或經驗來辨別真假資訊，或者他們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搜索引擎來查證可疑的訊息。因此，他們傾向於依賴親友來驗證網路上的資訊，將親友視為闢謠的主要渠道。L 表示：

比較少自己 Google，我都是推理。在臉書上看有人講的好像還不錯，我會

分享給朋友看看，順便問說，這個講的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有的朋友會回

我：假的啦！我就知道了，以後看到我就知道是假的。

L 的言談明顯揭示，她在面對網路訊息時的疑慮與應對策略，並非直接透過數位工具查證訊息，而是優先尋求親友的意見與回饋，以此來判斷訊息的真偽。

這種趨勢並非僅限於個別案例，而是反映了高齡者在面對數位媒體素養的挑戰時，如何依賴自己的社交網絡來彌補技能不足的一種普遍情況。進一步地，這也強調在解決高齡者數位落差問題上，親友與社區的角色的重要性。

對於高齡者來說，由於缺乏闢謠技能且未知如何學習，他們經常選擇消極無視來抵抗假訊息的傳播。他們的行為方式可能表現為避免轉發不確定的訊息，或者是對收到的訊息進行刪除，而不是積極去尋求事實真相。G 的語言也印證了這種趨勢。他表示：

除了圖片以外，我都不傳。因為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我不曉得真相，

所以都不傳。除了那些早安影片、或者唱歌影片，無傷大雅，就傳一下。

政論的那些，我都不傳。如果有人傳，我會刪掉。我也不想看，也不會回

覆。

對於健康相關的訊息，一部分的高齡者有一種批判性的解讀角度。以 M 為例，他並未特別重視網路上流通的健康資訊。他認為這些健康訊息並非單純的新聞

報導或專業意見，反而更像是市場行銷的一種手段。因此，他也不會轉傳給別人。

M 表明：

我沒有特別關注健康類訊息。我不會去注意那些東西。因為吃什麼東西主要是市場在操作，放了什麼東西給你，不會特別去挑有營養什麼的。我也不會轉傳。我什麼東西都沒有轉傳過。那些東西你不曉得真假，你就不會去傳。有些東西，對方應該也知道，不需要我去傳。

這樣的觀點揭示出，高齡者在接收網路訊息時，並非全盤接受。他們具有對於訊息的判斷能力，並願意對網路資訊持有批判性的思考。受訪者 G 也表達他對不確定訊息的消極應對策略，即不轉發任何他無法確認真偽的訊息，並將其直接刪除。另一名受訪者 H 則說：

(朋友) 都有在傳，我幾乎都沒看。一直都有，大家都會傳。很多人傳吃什麼可以防癌，吃香蕉可以怎麼樣。一直都會有。有的人是喜歡在群組傳，有的人是好心，覺得有用的資訊就分享。看不看就是自己的事情，我大部分就不看，直接刪掉。我還是會打開，讓對方看到我已讀。然後我不會認真去看那個資訊。

從她的回答中看出，即使面對大量的訊息傳播，H 並未積極去辨識訊息的真偽，而是選擇忽視或刪除這些訊息。

部分高齡者以社群平台作為主要接收資訊的平台，根據感興趣的話題再進行進階的搜尋和查證。他們不會立即相信社群媒體流傳的內容，卻視這些內容為一種議程設定，意指高齡群體依賴具有社交性質、使用者原創內容的平台作為生活的主要資訊來源。而針對感興趣的內容，他們再主動搜尋更多資料佐證。59 歲的男性受訪者 E 說：

國際版的 TikTok (抖音) 和 YouTube 上面會有一些短視頻，有養生的資訊，我會再去求證。有興趣的話會再去 Google 啦。有需要的症狀的時候，

會去看看到底可不可以這樣，也不是看了就信了，但大概都是從廣告和短視頻上看到的。



具備闢謠和查證意識的高齡者會更為謹慎地對待接收到的訊息。他們不僅對社交平台上的內容保持著懷疑態度，而且會根據訊息是否有可靠的來源來評估其可信度。

J 表示他只有在對訊息有八成的確定性時才會將其傳給朋友。他會查證訊息的公信力，例如是否有具體的消息來源。他指出：

80% 確認的話，我會傳給朋友。如果我覺得這個不是可靠的訊息，我不會傳。我今天看到一個中時的新聞，臺大醫院的人說爬山爬樓梯會造成骨頭傷害，這是錯誤的。這個我會再去查一下這個資訊，這是臺大骨科副主任說的話，非常有公信力。如果他沒有一些研究的基礎，他不敢發佈這個訊息的。不然會對他的職涯造成很嚴重的傷害。所以有他的公信力。如果只是說專家指出，就看看就丟掉，那個都是騙人的。

這些見解突顯出高齡者在面對社交媒體資訊時的批判思考能力，他們透過確認訊息來源的公信力，以確保所接收並傳播的訊息的真實性。這種主動求證的行為可視為高齡者在面對數位媒體中的假訊息風險時，一種主動防範的策略。

擁有關謠與查證意識的高齡者，不只針對收到的訊息表現出更高的審慎態度，也會運用數位工具輔助查證，使得群組內的資訊流通能有這些工具的監督與輔助。

例如，在臺灣有一款由工程師徐曦於 2018 年 12 月開發的名為「美玉姨」的 LINE 聊天機器人，旨在協助使用者審查收到的來自 LINE 的可疑訊息，使其能夠擁有更為真實且準確的數位資訊環境。其中，受訪者 K 就是「美玉姨」這項服務的用戶之一。她說：

還是會有假的欸，還是要看一下。有些群組里會有跳出來訊息說，這個訊息未經證實，請勿轉傳。那個叫做美玉姨。所以我不確定的時候，不會去傳，我怕害到別人，萬一別人真的相信怎麼辦。



這段話揭示一部分高齡者已經具備藉由數位工具來闢謠的能力，並能以謹慎的態度對待他們接收到的資訊。

儘管社群媒體被眾多高齡者視為重要的資訊來源，但並非所有的高齡者都無條件接受所有平台。根據 J 的陳述，他有意識地避免使用某些社群平台，如抖音，並對其流傳的內容持懷疑態度。他認為這些平台上的許多內容可能假造或誇大，並可能導致誤解。J 提及抖音的時候表示：

我沒有下載。別人轉過來就可以看。臉書滑到的也有。抖音很多拍的很假的，在那邊演戲。我覺得平台沒有管理、約束的東西，會造成你的誤判。

有的東西是真是假，你沒有辦法判斷的時候，會導致誤判。

這種意識到平台可能產生的誤導並對其進行主動避免的行為，突顯了高齡者在數位媒體環境下的判斷能力。他們不僅考量內容的真實性，也思考媒介本身可能帶來的問題。這種偏好和選擇不僅反映出他們對資訊的審慎態度，也揭示出他們在處理假訊息時的自主防護策略。

第六節、高齡者自我感覺「不再年輕」，需要親友鼓勵

自我效能感不足是高齡者面對新事物的較大心理障礙。面對數位時代，高齡者的自我效能感不足體現在對年紀大的不自信、與年輕人距離很遠及認為自己不需要再費力學習。不足自我效能感對高齡者來說，不僅是他們面對新事物的心理障礙，更是影響他們數位媒體素養的重要因素。由於缺乏對自身能力的信心，這使得他們往往對自己的學習能力持有負面態度，並將自己與較年輕、較能適應數位時代的群體視為兩極。進一步地，他們可能認為，鑑於自身的年齡和生活狀況，再去學習新的數位知識和技能並不必要。

這種低自我效能感不僅限制了高齡者提升自身數位媒體素養的動力，也成為他們面對數位假訊息挑戰的主要阻礙。這往往使他們在處理假訊息時感到無力和困惑，更有可能成為假訊息的受害者。

B 提到自己的先生很熟練使用手機和社群平台，自己則不需要再學習，她說：

我有他們就好了。像是我先生，他就比較會，他也會比較喜歡玩手機，我覺得可能就是個性吧，我自己覺得有就好啦，有什麼就問他，讓他幫我。

對於高齡者而言，自我定位和自我認知在學習新技術，例如網路技術，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當高齡者將自身定位為「很老」或感覺「與年輕人的距離很遠」時，他們可能在面對新學習的挑戰時感到困難，進而缺乏學習動機。

六十八歲的 I 在面對難以自我解決的技術問題時，會轉向他的兒子尋求幫助：「不會操作都問兒子。兒子都會幫我解決設定的問題，不然老人家要問誰？」他的言語反映出高齡者面臨的困境，就是在自我效能感不足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會感到無助，尤其是當他們需要解決與新技術相關的問題時。當高齡者對於自身的能力感到不確定或不足時，他們可能會面臨學習困難，甚至產生抵制新知的態度。72 歲的 M 認為自己年紀大，無法跟上網路的潮流，於是自我效能感較低。他表示：

現在跟你們年輕人比，當然比不上啊。你們年輕人一大堆花樣，我見都沒見過。就算比較老一點的東西，都還記得，還在用。新的東西沒辦法學了，網路上沒學的東西太多了。很多技能也用不到了。

實際的年齡多寡已不是評判年老的依據。64 歲的 N 也認為自己年紀很大，沒有必要學習新東西，對自身不太有自信並且也習慣依賴晚輩處理網路的問題。他說：

我們年紀到現在這樣差不多，應該是夠了。像是購物的話，我就沒有興趣啊，就比較不會那麼麻煩。

76 歲的 O 也提及，瀏覽社群平台上的訊息時會挑著看，因為擔心受騙。「老人家」對於高齡者而言，不僅僅是一個年紀標籤，還是有著弱勢和較易受傷的意涵。O 受訪者說：

我會怕，很容易上當。我會挑著看，因為很怕遇到騙子，我們畢竟是老人家，沒有年輕人那麼反應好，我們不小心按錯了，進入他們的圈套，我們就很麻煩，是這樣子。

年紀 72 歲的 P 雖然每天上網時間長達四小時左右，但他卻認為自己很不會使用網路，因此看到可疑的資訊也不會特別查證。他認為自己並不以使用電子產品為生，即便遇到困難無法得到幫助，也無傷大雅。P 說：

我上網不及格，也就是說不會。你叫我每件事情去上網，那我不會。我對網路恐怕，一百分的話，只有五分十分而已。像白痴一樣。

相反，若高齡者認為自身的年紀「不算大」或是「還年輕」，在學習心態上更加開放與積極。具有這種年輕心態的高齡者，他們會更主動學習使用網路和數位科技，進而提升自己的數位媒體素養。他們在閱讀和處理網路資訊的過程中，能夠更加識辨真假，並對網路資訊保持較為警惕的態度。他們利用網路的能力也相對強，能夠利用網路資訊來豐富自己的生活 and 解決實際的問題。這種情況顯示出，自我效能感對高齡者在數位媒體素養方面的提升具有重大的影響。

熟練使用電子支付、社群媒體和各個影音串流平台的受訪者 K 表示：

我覺得要跟年輕人一樣，不能什麼都不會，我們 65 歲也不是很老啊！我覺得啦。什麼都不會，我也會害怕和緊張。

除了自身因素之外，高齡者也可能因為社群媒體上流傳的聳動、誇張的內容而感到厭惡，從而排斥網路資訊。受訪者 F 提到，曾看到有友人在群組裡分享政治相關的激烈言論，造成群組的矛盾，因此現在不太在意資訊的內容，而是互動為主。F 說：

(健康資訊) 剛開始好像都很多，但我不會特別去在意，我也不會去嘗試。這個訊息大家都各說各話，不一定是真的。我不一定去相信，我是很單純的人，家人顧好就好，不要讓這些影響自己的心情。



高齡者欲提升數位素養，親友是最直接、有效的助力。不少使用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是配戴智慧型手錶的高齡者，背後都有協助或支持他們進行數位化轉型的親人，多半是兒女或手足。子女為高齡者配置電子產品後，高齡者已具備跨越數位落差的先決條件，從而啟發他們進一步學習使用和生活數位化的進程。A 的女兒在 A 退休後，為他添購電腦。A 在退休前，完全沒有接觸電腦的經驗，因為女兒為其購買和介紹，對電子產品的態度積極。A 提到：

電腦是不錯的，很多東西可以看！我小孩教我的，我的女兒說‘電腦我送你一個！’，那你既然要送我，我就要一個。哎，電腦真的很好！

六十五歲的 K 使用多個影片串流平台以觀看影視作品，問及如何開始使用這些平台，她表示女兒提供許多幫助。K 說：

我女兒有什麼帳號會讓我加入。我比較喜歡學，我女兒就說‘你就學，有問題就來問我就對了。只要不會的，就用問的，操作給我看一次，我就會了。我通常都是問女兒，我會自己先去試試看，比較卡關的時候會問啦。

64 歲的女性受訪者 L 因為女兒嫁到馬來西亞，早期學習使用電腦及通話軟體 MSN 來與旅居海外的女兒聯絡。她表示說：

我從很早就開始 MSN，sunny 媽媽（二女兒）還沒開始用，我就開始用了。sunny 媽媽他們那時候在上海，sunny 的阿姨在馬來西亞，我為了跟她通電話，我就開始用。20 年前，用電腦用的。後來我現在搬來內湖，舅舅

去當兵。兒子就幫我設定，靠打電話來跟大家聊天。我搬來這樣 20 年，電腦好舊了，就乾脆不用了。



可見，親友是大部分高齡者使用網路與電子產品的最大誘因。與家人聯繫是首要的原因。家人對於高齡者學習使用電子產品的教學支持和幫助，也相當重要。L 還說：

電腦好像是我自己買的，遇到瓶頸就打電話，我就打電話問我妹妹，或者我的朋友，硬學起來。我也沒讀什麼書，就是靠硬背。遇到不會的，問家人、我妹妹、或者朋友，那些會用的人。我妹妹的學歷比我高，她又自己開公司，沒辦法就打電話問。

對於高齡者來說，他們的子女在數位媒體素養提升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子女的貢獻不僅在於他們購買並提供電子產品給父母使用，更在於他們的主動性和持久性支援，這對於父母能否順利適應新科技、提升自己的數位媒體素養有著顯著影響。以受訪者 M 為例，他身上的蘋果手錶及其他 3C 用品，大部分都是由女兒購買的。受訪者 M 表示：

Apple pay 有設定，但是沒使用。有次跟朋友吃飯，他就是用那個付，我就覺得欸好像蠻方便的，等於用信用卡綁定嘛，我就自己設定。後來我就是用了半天就不曉得怎麼用付款，我就懶得用了。

72 歲的受訪者 P 表示，年輕人沒耐心，因此遇到困難的地方之後難以反覆詢問。P 說：

剛開始問兒子，後來問朋友。兒子不好問，會生氣。年輕人沒耐心語氣就
不好。只好（跟朋友）聊天的時候順便問啊，但他告訴我之後，第二天我就
忘了，朋友就會告訴我第二次。

P 遇到手機操作的問題，不僅無法即時得到解決，甚至也會造成親人間更大的摩擦，使得他只好尋找其他的方法，或是暫時忽略遇到的難題。親友若不持續支持和協助高齡者使用電子產品，會阻礙他們學習的動力。

高齡者認為自身歲數已高，學習能力下降，而對年輕人更是產生依賴感。因此，家中親友的支持尤其重要。71 歲的 G 表示剛開始時，若有兒女教學能夠省力許多。G 說：

剛開始的時候，都是兒子教我的。後來功能都是自己找的，不會的再問。

那些重頭自己學，要學很久，會看不懂。

除了親友之外，周遭的人例如同事和朋友，也會影響高齡者對於電子產品的態度。若經親友推薦，高齡者更容易接受電子產品，並有正面的印象。當身邊的親朋好友均使用電子產品保持聯絡，高齡者更傾向於學習新的數位技能，以保持社交活躍。

退休之際，A 的同事推薦其使用電腦打發閒暇時間。他說：

退休的時候我就跟同事說，哎呀，退休之後真無聊。同事就跟我說，有一個電腦，我就不會無聊。我發現真的是這樣，不會無聊了！

對於年長使用者來說，對社交生活的滿意度可能會直接影響他們使用網路的頻率和廣度，並可能影響他們對於網路功能的掌握程度。當這些使用者的社交生活情況較為滿意時，他們可能會更頻繁地使用網路進行社交活動，並且在身邊有人協助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會更快地掌握和使用網路功能。

以 H 為例，她在公司的環境下，能夠迅速且積極地掌握和使用各種網路功能。她表示：

是因為在公司才會使用這些功能，line pay 也是因為公司，台灣 pay 是有人來公司宣傳。line pay 是有 line 的時候，大家都加，所以我會跟著加。上班有一個好處就是，你比較會跟得上大家的腳步。街口支付什麼的、載具我

也都會用。公司（氛圍）很好，好用的話，大家都會互相推薦。互相教學。還不錯，有什麼好康的話，大家團購什麼的，都會一起。



H的經驗表明，當高齡者處於一個社交環境中，他們能夠更快地接受和學習新的技術和工具。這種社交學習的效果可能遠超過個人獨立學習。此外，當高齡者的社交生活滿意度較高時，他們也更可能主動尋找和利用網路的社交功能，進一步提升他們的網路素養。

提供高齡者一個共同討論和學習如何使用數位工具的場域，無疑對提升他們的數位素養有重大的助益。這種學習場所可以促進經驗的共享，讓他們能更直觀地理解和掌握數位工具的操作，並為他們提供實際操作數位工具的機會，從而提升他們的技能和信心。

以受訪者L為例，她在爬山的朋友們的幫助下，學會了如何在臉書上發文，並學會了如何設定私人可見和所有人可見的權限設定。L說：

我朋友都說，你不要亂傳喔！我就說我沒有什麼隱私，就是都上傳。朋友有一次發現我的那些照片全部都上傳，朋友會提醒我，全部相冊都看得
到，他們就會跟我說要封鎖。

這種交流模式展現L如何透過與朋友的交流和共享，來提升自己的數位操作能力。這種社群式學習對於高齡者而言，不僅提供了一種學習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實質上減輕了他們的學習壓力，使他們能在較為輕鬆的情境中，逐步提升自己的數位素養。透過建立這樣的學習環境或場域，我們可能更有效地幫助高齡者縮小數位落差，並提高他們的數位媒體素養。

年齡不僅僅是一個生理的概念，它同時也與心理的認知密切相關。對於高齡者來說，一個「心態年輕」的自我認知可能對其學習新知，尤其是網路科技的學習，具有重大影響。心態年輕的高齡者可能更易於接受新事物，並在面對變遷和挑戰時具有更高的適應能力。相反，一個消極、老化的自我認知可能會降低高齡者的自我效能感，使其更難以跟上時代的腳步。受訪者H認為只有心態年輕，才會繼續學習，她表示：

對啊，一定要這樣心態年輕。這段時間忙完後，一定要去運動中心或是哪裡。是真的在想，要健康的身體才有用。



這顯示心態年輕的高齡者不僅關注自身的健康，也積極求知，並用行動來改善自身的狀態。

此外，這種年輕的心態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改變高齡者與網路科技的互動方式，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掌握新的網路知識和技能。當他們能夠主動、積極地接觸和學習網路科技時，他們就更可能獲得網路所帶來的各種利益，並避免由於不熟悉網路而對他們帶來的可能威脅。因此，培養高齡者的心態年輕，可以視為提高他們網路素養的一種有效策略。

參與媒體素養教育活動可以有效地協助長輩抵抗假新聞。C 是 72 歲的女性受訪者，曾經參加手機直營店所提供的免費教學課程。該課程主要教授手機使用技巧，包括使用相機、錄像以及整理照片等。即使 C 不滿意她的社交生活，聲稱沒有子女在身邊可以幫助她使用電子產品，她仍然因為有過學習使用電子產品的經驗，自我效能感提升，願意繼續參加學習的課程。對 C 而言，她更關注電子產品功能帶來的生活便利性，相對地，使用這些產品來滿足社交需求的動機並不顯著。C 說：

朋友傳的什麼資訊都有，詐騙也很多。我會去查核，看一下真的假的。自己想辦法。不像很多人家裡有年輕人，我們只能靠自己了。你要是在社區開課的話，我第一個報名。

針對高齡者的媒體素養課程，不僅需要從基本功能開始，還需注重實際演練和反覆複習。不少受訪者如 C 提到，若不反覆練習操作，不久後便容易遺忘操作的方式。老年人因記憶退化帶來的生活改變常感到消極，從而影響自我效能感。



第五章、研究結論



本論文透過深度訪談研究方法，揭示高齡者在數位時代中的網路生活經驗。經由分析高齡者的網路社交平台上的行為模式，以探討假新聞現象發生的類型與情境等面相，並探討高齡者進行事實查核上的問題。

第一節、關注高齡者的假訊息研究

本論文發現，高齡者對於與健康相關的訊息，分享行為相當活躍。當他們在自己或親友中察覺到身體微恙時，對於各種養生保健資訊會變得格外敏感。高齡者經常接觸的假訊息內容多元且範疇廣泛。其中，與健康維護相關的訊息包括食補建議、保健體操（如保養眼睛及強健身體的運動）、各類健康食品的使用方式等。在訊息洪流中，有些如「十大瘦身食物」等似乎帶有誇大成分的訊息，高齡者們則常會持保留態度，認為實踐結果更多的取決於個人自身的體質與習慣。

除了健康相關的訊息外，福利政策也是高齡者非常關注的議題。面對關於政府福利的各種訊息，他們在分享與轉發的過程中，也往往會遇到許多真偽難辨的情形。這些不僅涉及他們的生活福祉，也可能影響他們與家人、朋友的互動和溝通。

同時，高齡者通常不會主動在網路上尋求健康相關資訊，因此他們往往成為被動的資訊接收者。當他們的資訊來源主要侷限於社交媒體如 Line 等單一平台，而無法接觸到更多元的資訊與不同觀點，這種單一資訊來源就極有可能成為他們易受假新聞影響的原因。

就上網的行為來看，高齡者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資訊的主要動機，不僅僅是傳遞資訊本身，更多的是在於維繫與人際互動的社交關係。其中較大的問題是，親朋好友分享的健康資訊往往代表著傳送者的好意，恰好為不實訊息裹上糖衣，讓假訊息得以肆虐高齡者的資訊世界。他們的資訊評估能力往往會被情感和對身體健康的關心所蓋過，更容易降低對訊息真實性的判斷力。他們對回應的期待遠超過對訊息內容的關心，凸顯出他們在網路行為中的人情取向。

本論文發現，高齡者在接收到假訊息時，可能礙於人情而不闢謠，擔心闢謠的指責為傳播者帶來不好的感受。多數高齡者提出，由於假訊息繁多且雜，在自身無法保證訊息正確性且查證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鮮少會對於群組裡流傳的假訊息進行評論或批評。維繫人際關係的使用動機，也成為高齡者讓假訊息有機可乘的原因。

本論文發現，仍有一些高齡者隨著數位時代不斷提升數位媒體素養，學會操作和應用電子產品。但在資訊充沛的網路世界中，高齡者往往無法抵禦各種標題的引誘，對於如何進行資訊查證更是毫無頭緒。即使有意識到查證的重要性，他們多數只能依賴 Google 進行二次驗證，對於 Google 上的內容缺乏必要的質疑與警覺。

令人鼓舞的是，高齡者並未因此退縮，他們已經展現出闢謠的警覺性，並逐步學習如何透過親友和專家的幫助進行查證。從這些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高齡者並非完全無法抵擋網路假訊息的威脅。即使他們可能面對網路操作的挑戰，他們也在不斷地學習與努力中，提升自身的防護能力。具有豐富網路使用經驗的高齡者，面對網路謠言時，有更多的判斷資源和能力，例如判斷有公信力的消息來源、識別釣魚標等。

儘管初期可能會遇到一些困惑與問題，但隨著經驗的累積，他們的識辨力和對於網路資訊的警覺性，都有所增強。他們已清楚瞭解網路上的假訊息橫行，因此會採取一種消極的抵抗策略，選擇對社群平台上的訊息保持一種保守的態度。

由於高齡者可能缺乏闢謠的技能或者不知如何獲得相關知識，他們通常選擇忽視或避免轉發他們不能確認真偽的訊息，來抵抗假訊息的傳播。他們並不會積極地去尋求事實的真相，而是選擇刪除那些收到的訊息。此外，對於健康相關的訊息，有些高齡者會採取一種批判性的解讀角度，例如 M 就並未特別重視網路上流通的健康資訊，他認為這些資訊更像是市場行銷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單純的新聞報導或專業意見。因此，他並不會將這些資訊轉發給其他人。

這些現象顯示出，高齡者並不會全盤接受網路上的訊息，他們具有一定的訊息判斷能力，並且願意對網路資訊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而對於他們感興趣的話題，他們則會主動進行進一步的搜尋和查證，這反映出他們對於社交媒體上的訊息並不輕易信任，而是把這些訊息視為一種引導他們去進一步了解和探索的議程設定。

然而，單靠使用經驗仍然有其局限性。對於經過精心製作的網路謠言，高齡者依然有可能難以辨識。在這種情況下，許多高齡者會選擇尋求他人的幫助，特別是

他們的子女或親密的朋友。他們會把自己不確定的資訊分享給這些人，希望透過他們的意見來了解資訊的真假。這種跨代的資訊查證，讓高齡者能夠從中得到對資訊的負面評價，進一步提升他們對社群平台上資訊的警覺性。這種以人際網絡為輔助的資訊識辨方式，有助於高齡者在面對網路假訊息時，有更多的資源和策略去應對。

由於高齡者對於網路的陌生與不熟悉，不只阻礙了他們進一步學習並有效利用數位資源的機會，更可能導致一種反作用力的產生。這種反作用力往往使他們萌生更大的防衛心理，以避免在網路上進行各種操作。例如，由於對網路購物流程的陌生與對網路交易安全的疑慮，高齡者往往會選擇避開網購，儘管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會錯失許多優惠與便利。同樣地，由於對網路隱私權保護的理解不足，他們也常常選擇不在網路上填寫個人資料，即使這意味著無法使用某些網路服務。此外，由於對網路安全和手機作業系統的知識有限，他們甚至可能會選擇不下載和使用某些有益的應用程式。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高齡者由於對社交平台如 Line 的操作機制不夠瞭解，因此往往誤以為所有在網路上流傳的訊息都是真實的，對於網路謠言的存在並無概念。對於 Photoshop 圖像修改、網路演算法、內容農場等相對複雜的概念，對於這些初次接觸數位產品的高齡者來說，則更是難以理解。他們在學習使用基本功能時就已面對困難，更別說去瞭解網路世界的複雜機制，以及這些技術如何可能被濫用。這無疑使他們在面對假新聞和不實訊息時處於更為不利的位置。

高齡者無法完全融入數位時代的原因不僅僅侷限於他們對於新科技的陌生感，更受到身體狀況不佳、電子產品設計不符合其使用需求，以及對於社交生活滿意度低落的影响。例如，許多受訪的高齡者都提到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在身體各項功能上的退化使得使用電子產品變得困難，包括因眼睛承受不住螢幕光線而降低使用手機的頻率和時間。

高齡者在提升媒體素養上的主要阻礙是缺乏興趣，這種缺乏興趣的狀況可能源於他們對社交生活的不滿。這並非僅指與親友的關係，良好的社區服務也能夠引導高齡者形成對網路社交和網路使用的正向態度。透過提升高齡者在各方面的社會生活品質，我們可以激發他們對數位時代更深層的社會參與意願。

例如，受訪者對其社交生活表示出不滿，他與老同學的距離遠、朋友數量有限，這些因素都導致他對網路社交保持消極的態度。這明顯地顯示出，對高齡者而言，他們對網路的使用態度與社交生活滿意度有著密切的連結。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社交已經困頓，就更無法期待他們透過網路來建立和經營更多的人際關係。

這種因為陌生和不熟悉所產生的防衛心理，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高齡者免於網路詐騙和隱私權侵犯的風險，但同時也限制了他們在數位世界中的行動能力，使他們無法充分利用數位工具來提升生活品質和社會聯結性。因此，如何協助高齡者克服這些障礙，提升他們的數位媒體素養，成為一個迫切且重要的議題。

高齡者與其他年齡族群一樣，也面對著訊息量大且複雜的挑戰。但他們對於社交媒體與網路機制的陌生，使他們在網路訊息的詮釋與理解過程中感到困惑，尤其是在分辨真假訊息上。相對於年輕族群，高齡者在瞭解網路操作與基本原理的方面，面對更大的困難。這源於社會體制並未提供足夠的教育資源，尤其缺乏針對高齡者的啟蒙教育，使他們在學習新技術上相對於其他族群處於弱勢地位。因此，當他們在嘗試理解網路這個新的世界時，往往會感到困惑和恐慌。

本論文經研究後發現，社交生活滿意度也深刻影響著高齡者對於數位學習的態度。當他們對自己的社交生活感到不滿意時，對於電子產品和社群平台的使用動態也相對缺乏興趣。反之，如果他們對自己的社交生活感到滿意，則更有可能投入時間和精力學習新的技能。興趣缺乏是高齡者無法提升媒體素養的一大障礙，這可能源於他們對社交生活的不滿意。若能提供完善的社區服務，幫助高齡者建立對網路社交和網路使用的積極態度，可能會提升他們的幸福感，進一步增強他們的社會參與感，使他們更順利地走進數位時代。

此外，自我效能感的不足也是高齡者面對新事物的一大心理障礙。面對數位時代，他們可能會因為年紀大、自覺與年輕人的距離遙遠，或是認為自己不需要再費力學習而感到不自信。對於高齡者來說，他們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認知在學習新技術，如網路技術等新知識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當他們將自身定位為「年紀大」或覺得與年輕人的差距過大時，這種心態便可能構成學習新事物的阻礙，讓他們在面對學習挑戰時感到困難，進而缺乏學習的動機和信心。

這種自我認知會影響他們對自我能力的評估，使他們認為自己不再具有學習新知的能力或是無法適應新的技術。因此，不再年輕的認知，不僅會限制他們的學習

慾望，也會影響他們對自我效能感的信任。所以，對於高齡者而言，打破這種自我定位和認知的困境，將是提升他們數位素養的重要課題。

本論文建議，高齡者可以從三個方面提升數位媒體素養。首先，親友的支持與協助是高齡者提升數位素養的關鍵。許多使用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或智慧手錶的高齡者，背後都有家人在默默地支持與協助他們進行數位轉型，特別是他們的子女或手足。這些家人在高齡者的數位學習過程中提供了必要且直接的技術支持，使高齡者具備了跨越數位鴻溝的先決條件。這不僅讓他們有機會親身接觸和使用新的科技，也鼓勵他們進一步學習，並逐漸習慣數位化的生活。

對於高齡者來說，進入網路世界的門檻可能很高，親友的支援則可讓這個過程變得較為容易。尤其是他們的子女在這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不僅在於提供和購買電子產品供他們使用，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主動性和長期的支援。這些因素都對父母是否能順利適應新科技、提升自己的數位媒體素養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然而，長期的媒體素養提升，還需要社會層面的廣泛支持和幫助，包括教育、政策以及各種社會服務等，都能有效地協助高齡者更順利地融入數位時代。

其次，提供高齡者一個共同學習和討論數位工具使用的場所，對於提升他們的數位素養有極大的助益。這種場所不僅可以讓他們分享和學習他人的經驗，使他們能更直觀地理解和掌握數位工具的使用方式，也為他們提供實際操作這些工具的機會，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技能和信心。

藉由共同學習和討論，高齡者同時可以滿足自己的社交需求。高齡者對社交生活的滿意度對他們使用網路的頻率和廣度，甚至對於網路功能的掌握程度都有直接影響。當他們對自身的社交生活情況感到滿意時，他們通常會更頻繁地使用網路來進行社交活動。

最後，媒體素養教育活動對高齡者的媒體素養有更加長遠和積極的效應。它不僅為高齡者提供必要的技術技能，讓他們能夠運用並熟練掌握各種數位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培養學習者對於媒體資訊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這種能力讓學習者在接觸媒體資訊時，能夠進行真偽辨別，理解其背後的語境和可能的含意，從而能做出更為理智且具洞察力的決策。

從長遠看來，媒體素養教育能塑造個體的媒體使用行為和價值觀。學習者透過持續的學習，會漸漸養成自己的媒體使用習慣，例如定期核實資訊的真實性、主動

學習新的數位技能等，而不是僅僅用於社交。本研究得出觀察，經過數位媒體素養教育的高齡者更善於利用電子產品便利自身的生活。同時，他們也會建立更為健康的媒體價值觀，如尊重知識產權、維護網路公共空間的秩序等。

媒體素養教育也有助於提升個體的社會參與意識。學習者在理解和掌握媒體工具使用的過程中，也能學會如何透過這些工具來進行自我表達、參與公共議題討論、進行社會交流，從而成為數位社會的積極參與者。透過媒體素養教育，個體的媒體素養將持續提升，並在數位化的社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之地。

第二節、研究貢獻、限制與研究建議

目前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與假訊息研究相對匱乏，先前的研究集中在青少年與學生的媒體素養教育。本論文適時填補臺灣高齡者數位素養教育方面的研究空白，提供理論基礎與實證參考。本論文為此領域開闢新的研究道路，並專注於高齡者與假訊息的關係，聚焦網路媒體素養。

在社會意義上，本論文指出高齡者傳播假新聞可能導致的家庭衝突問題，揭示此類衝突源於成年子女對高齡者需求理解不足的現象。這不僅對於瞭解並解決當前家庭溝通與社會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同時也強調高齡者在數位時代的話語權。

此外，透過對於高齡者數位媒體素養的研究，本論文為高齡者的數位教育提供具體建議。透過理解和認識高齡者如何與數位媒體互動，可以為他們設計更適合、更有利於提升其數位媒體素養的教育方案。進而提升高齡者在數位時代的話語權，並為他們在面對假新聞時擁有更完善的應對能力。

本論文雖展開老人與假訊息的相關研究，然本論文的限制在於只對臺灣某一區域的高齡者進行深度訪談和分析，涵蓋性並不足。另外，因為每位高齡者處於的數位媒體素養不同程度，本研究並未能夠針對各種層面具體討論提升媒體素養的策略。

針對這些限制，對未來研究方向有以下建議。首先，有必要進行更細緻的分類研究，對不同數位媒體素養程度的高齡者分別進行深入探討。理解這些不同群體在使用數位媒體時面臨的特定挑戰，將有助於教育者提供更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以適應高齡者在數位媒體素養上的需求。

其次，本論文建議透過實驗法研究和評估提升高齡者數位媒體素養的教育方法。這將有效學習這些教育方法在防止假新聞傳播方面的效力和成果，並根據這些結果來調整教育策略。

最後，基於對高齡者網路需求的了解，建議未來研究能進一步探討如何利用傳播科技來提升他們的話語權。除了網路使用模式外，未來研究可鑽研高齡者網路使用、自我效能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更有效地為設計未來的數位教育策略帶來啟示。

參考文獻



- 方格正、李佩怡（2016）。〈詮釋現象心理學方法論之整理與補充〉，《本土心理學研究》，46：121-148. <https://doi.org/10.6254/2016.46.121>
- 王瑞堦（2002）。〈從詮釋現象學觀點探討國小電腦課[人機互動]現象〉，《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29，75-102.
- 伊佳奇（2021）。〈疫情推動科技與網路的運用更為普及，卻成為高齡者夢魘的開始〉，《關鍵評論》。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3678>
- 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和王婷玉（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臺北市：時英。
- 李維倫、賴憶嫻（2009）。〈現象學方法論: 存在行動的投入〉，《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5，275-321.
- 李維倫（2004）。〈以[置身所在]做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之方法論〉，《應用心理研究》，（22），157-200.
- 吳玲臻、陳柏樺（2022）。〈事實查核組織查的都很「瞎」？陳慧敏：選題都有一定傳播熱度，代表不少人相信並分享，感謝專家願意耐心答覆〉，《事實查核中心》。取自：<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7965>
- 余德慧（2001）。《詮釋現象心理學》，心靈工坊文化。
- 邱俊維、張嘉萍、詹景涵、葉香伶（2022）。〈高齡者易被假訊息所誤 融入式教學助提升媒體素養能力〉，《銘報即時新聞》。取自：
<https://mol.mcu.edu.tw/%E9%AB%98%E9%BD%A1%E8%80%85%E6%98%93%E8%A2%AB%E5%81%87%E8%A8%8A%E6%81%AF%E6%89%80%E8%AA%A4-%E8%9E%8D%E5%85%A5%E5%BC%8F%E6%95%99%E5%AD%B8%E5%8A%A9%E6%8F%90%E5%8D%87%E5%AA%92%E9%AB%94%E7%B4%A0%E9%A4%8A/>
- 姊妹淘（2021）。〈鄧惠文揭「假訊息的操作公式」！長輩講不聽是你不夠關

心〉，《NOWnews 今日新聞》。取自：

<https://www.nownews.com/news/5314418>

林玉鵬、王維菁、陳炳宏（2020）。〈數位網路時代下媒體素養教育政策再思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5（1），115–136。取自：

[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2003_65\(1\).0005](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2003_65(1).0005)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質性研究方法：訪談模式與實施步驟分析〉，《身心障礙研究》，3（2），122–136。

<https://doi.org/10.30072/JDR.200506.0005>

林育萱（2020）。〈「衛生紙原料被拿去做口罩了」 散布假消息 3 女依法送辦〉，《上報》。取自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4&SerialNo=80968

林照真（2020）。〈假新聞類型與媒體聚合：以 2018 年臺灣選舉為例〉，《新聞學研究》，142，111–154。 [https://doi.org/10.30386/MCR.202001_\(142\).0003](https://doi.org/10.30386/MCR.202001_(142).0003)

郭琇真（2021）。〈「假新聞清潔劑」教長輩查證偽訊息 逢凶化吉〉，《聯合新聞網》。取自：<https://sdgs.udn.com/sdgs/story/120967/5158848>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2）。〈2022 年台灣網路報告〉，《TWNIC》。取自：

https://report.twinc.tw/2022/assets/download/TWNIC_TaiwanInternetReport_2022_CH.pdf

柯舜智（2020）。〈落實媒體素養，縮小數位落差-連結學生與中高齡社群的行動導向學習評量實踐〉，《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系》。取自：

<http://ir.lib.pccu.edu.tw/handle/987654321/50376>

柴敬博（2021）。〈面对人口老龄化后疫情时代“老有所依”如何保障？〉，《中國新聞網》。取自：<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3-03/9423496.shtml>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 2070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取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695E69E28C6AC7F3

陳佳君（2020）。〈沈伯洋：解讀疫情之下的中國資訊戰〉，《P#新聞實驗室》。取自：<https://newslab.pts.org.tw/news/230-%E6%B2%88%E4%BC%AF%E6%B4%8B%EF%BC%9A%E8%A7%A3%E8%>

[AE%80%E7%96%AB%E6%83%85%E4%B9%8B%E4%B8%8B%E7%9A%84%E4%B8%AD%E5%9C%8B%E8%B3%87%E8%A8%8A%E6%88%B0](#)

陳彥琪（2020）。〈愛亂傳假消息，糾正他還被嗆「有讀書了不起？」心理師剖析長輩為何總是拒絕溝通〉，《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668589?mode=whole>

賀軍（2020）。〈另類電子鐐銬？因疫情猛爆而生的中國「健康碼」黑科技〉，《鳴人堂》。取自：<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972/4491297>

莊賢捷（2021）。〈假訊息分為「民間謠言」與「有意圖的訊息」，高齡長者成為疫情下的受害者〉，《關鍵評論》。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1825>

張靚雯（2021）。〈廣東推出“健康防疫核驗系統”便利“無碼”人群〉，《人民網》。取自：[http://gd.people.com.cn/BIG5/n2/2021/0203/c123932-](http://gd.people.com.cn/BIG5/n2/2021/0203/c123932-34563213.html)

[34563213.html](http://gd.people.com.cn/BIG5/n2/2021/0203/c123932-34563213.html)

黃雅琪（2021）。〈假訊息趁本土疫情爆發亂竄 檢警 4 個月偵辦 636 件移送 489 人〉，《鏡週刊》。取自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912edi008/>

葉乃靜（2020）。〈後真相時代社群媒體上的假新聞分享行為研究。〉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46（1）, 96-112.

楊惟任（2019）。〈假新聞的危害與因應〉，《展望與探索月刊》，17（12）。

葛緯詩（2020）。〈衛生紙之亂 2.0 源頭抓到了！一張圖看謠言散佈有多快〉，《網路溫度計》。取自：<https://dailyview.tw/Popular/Detail/7818>

願景工程（2019）。〈先搏感情再教求證「假新聞清潔劑」走入長輩生活圈〉，《聯合報》。取自：<https://sdgs.udn.com/sdgs/story/12425/3657207>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

劉芮菁（2021）。〈【世紀之疫遇上假訊息】別亂怪長輩愛傳假訊息 換位思考去理解資訊和情感需求〉，《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取自：<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6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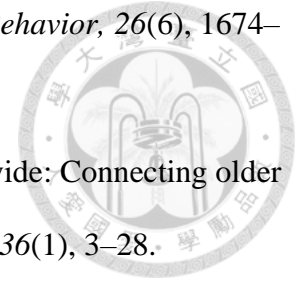
劉致昕、柯皓翔、許家瑜（2019）。〈LINE 群組的假訊息從哪來？跨國調查，追出內容農場「直銷」產業鏈〉，《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information-warfare-business-disinformation-fake-news-behind-line-groups>

- 蔡楨永、龍希文、林家安（2019）。〈高齡者面對網路謠言困境之探討〉，《國際數位媒體設計學刊》，11（1），53-59。
- 蔡琰、臧國仁（2008）。〈熟年世代網際網路之使用與老人自我形象 與社會角色建構〉，《新聞學研究》，97：1-43。
- 蔡琰、臧國仁（2010）。〈爺爺奶奶部落格一對老人參與新科技傳播從事組織敘事之觀察〉，《中華傳播學刊》，18, 235-263.
- 蔡琰、臧國仁（2013）。〈兒孫輩輔助家中長輩學習電腦之調查研究〉，《興大人文學報》，（51），87-113.
- 謝子霖、屠正洋、姚望、施尚潔、潘辰昊、徐榕榕、陳亦瑄、馮鼎銘（2015）。〈武汉大学 中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调查报告 数字鸿沟现象突出〉，《中文互聯網數據研究資訊中心》。取自：
http://www.199it.com/archives/385618.html#google_vignette
- MyGoPen（2021）。〈【公告】MyGoPen 再獲 IFCN 國際事實查核聯盟認證！將持續推動資訊識讀〉。取自：<https://www.mygopen.com/2021/09/IFCN-2021.html>
- Augner, C. (2022). Digital divide in elderly: Self-rated computer skills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education, better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increased mental health.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https://doi.org/10.1016/j.ejpsy.2022.03.003>
- Barber, A. (2022). Man pleads guilty to scamming the elderly, transferring stolen money to Nigerian bank accounts. *WOWK 13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owktv.com/news/crime/man-pleads-guilty-to-scamming-the-elderly-transferring-money-to-nigerian-bank-accounts/>
- Basiouny, A. (2022). Who is falling for fake news? *Knowledge at Wharton*. Retrieved from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who-is-falling-for-fake-news/>

- Blažič, B. J., & Blažič, A. J. (2020). Overcoming the digital divide with a modern approach to learning digital skills for the elderly adults.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5(1), 259–279. <https://doi.org/10.1007/s10639-019-09961-9>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 Pierre Bourdieu ;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ashier, N. M. & Schacter, D. L. (2020). Aging in an era of fake new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29(3), 316-323. doi:10.1177/0963721420915872
- Brashier, N. M., Umanath, S., Cabeza, R., & Marsh, E. J. (2017) Competing cues: older adults rely on knowledge in the face of fluency. *Psychol Aging*, 32(4):331–337
- Broady, T., Chan, A., & Caputi, P. (2010). Comparison of older and younger adults' attitudes towards and abilities with computers: Implications for training and learnin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1(3), 473–485. <https://doi.org/10.1111/j.1467-8535.2008.00914.x>
- Bronstein, M. V., Pennycook, G., Bear, A., Rand, D. G., & Cannon, T. D. (2019). Belief in fake news is associated with delusionality, dogmatism,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reduced analytic thinking.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8(1), 108–117. <https://doi.org/10.1037/h0101832>
- Chen, Y.-P., Chen, Y.-Y., Yang, K.-C., Lai, F., Huang, C.-H., Chen, Y.-N. & Tu, Y.-C. (2022). The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fake news on COVID-19 vaccination in Taiwan: Retrospective study of digital media.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4(4), e36830-e36830. doi:10.2196/36830
- Chung, J. E., Park, N., Wang, H., Fulk, J., & McLaughlin, M. (2010). Age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onlin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mong non-users: An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6), 1674–168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0.06.016>



Delello, J. A., & McWhorter, R. R. (2017). Reducing the digital divide: Connecting older adults to iPad technology.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36(1), 3–28. <https://doi.org/10.1177/0733464815589985>

Chen, D. T., Wu, J., & Wang, Y. M. (2011). Unpacking new media literacy. *Journal of Systemics, 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cs*, 9(2), 84–8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Fake news and disinformation on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europa.eu/eurobarometer/surveys/detail/2183>

Friemel, T. N. (2016). The digital divide has grown old: Determinants of a digital divide among seniors. *New Media & Society*, 18(2), 313–331.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45386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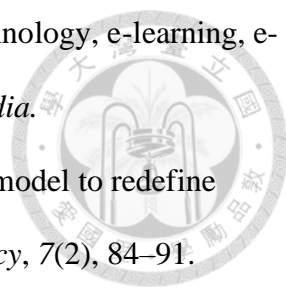
Grinberg, N., Joseph, K., Friedland, L., Swire-Thompson, S. & Lazer, D. (2019). Fake news on Twitter during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Science*, 363, 374–378. doi:10.1126/science.aau2706

Guess, A., Nagler, J. & Tucker, J. (2019). Less than you think: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fake news dissemination on Facebook. *Science advances*, 5(1), eaau4586.

Hess, T. M., Popham, L. E., Emery, L. & Elliott, T. (2012). Mood, motiv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Aging and affective state influences on memory. *Aging, Neuro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19(1-2), 13-34.

Hill, R., Betts, L., Gardner, S. & Street, B. (2015). Empowerment and enablement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generation of the digital ag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8, 1-23.

Hunsaker, A., & Hargittai, E. (2018). A review of Internet use among older adults. *New Media & Society*, 20(10), 3937–3954.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8787348>

- 
- Iskander, M. (Ed.). (2008). Innovative techniques in instruction technology, e-learning, e-assessment and educatio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Jacobson, T. E., & Mackey, T. P. (2013). Proposing a metaliteracy model to redefine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munication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7(2), 84–91.
<https://doi.org/10.15760/comminfolit.2013.7.2.138>
- Jacoby, L. L., & Rhodes, M. G. (2006). False Remembering in the Aged.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15(2), 49–53. <https://doi.org/10.1111/j.0963-7214.2006.00405.x>
- Koltay, T. (2011). The media and the literacies: media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2), 211–221.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0393382>
- Lam, J. C., & Lee, M. K. (2006). Digital Inclusiveness--Longitudinal study of internet adoption by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2(4), 177–206. <https://doi.org/10.2753/MIS0742-1222220407>
- Leonardi, C., Mennecozzi, C., Not, E., Pianesi, F. & Zancanaro, M. (2008). Designing a familiar technology for elderly people. *Gerontechnology*, 7(2), 151.
- Lindblom, K., Gregory, T., Wilson, C., Flight, I. H., & Zajac, I. (2012). The impact of computer self-efficacy, computer anxiety, and perceived usa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on the efficacy of a decision support tool for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 JAMIA*, 19(3), 407–412.
<https://doi.org/10.1136/amiajnl-2011-000225>
- Lindeman, E. (1924). Social discovery: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unctional groups. *Republic Publishing Company*.
- Liu, C., Wu, T., & Chang, W. (2019). Online news sharing among Taiwan'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opulaces: Influencing factors.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6(1), 714–715.

<https://doi.org/10.1002/pr2.146>

Nahl, D. (1997). Information counseling inventory of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reactions while learning the Internet. *Internet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 2(2-3), 11–33.

https://doi.org/10.1300/J136v02n02_04

Martins Van Jaarsveld, G. (2020). The effects of COVID-19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 case for closing the digital divide.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1, 577427–577427.

<https://doi.org/10.3389/fpsy.2020.577427>

Moore, R. C., & Hancock, J. T. (2022). A digital media literacy intervention for older adults improves resilience to fake news. *Scientific Reports*, 12(1), 6008–6008.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2-08437-0>

Munger, K., Luca, M., Nagler, J. & Tucker, J. (2020). The (null) effects of clickbait headlines on polarization, trust, and learn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4(1), 49-73.

Ofcom (2014). Making sense of medi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fcom.org.uk/research-and-data/media-literacy-research/approach>

Ofcom (2017). Ofcom's approach to online media literac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fcom.org.uk/data/assets/pdf_file/0015/229002/approach-to-online-media-literacy.pdf

Pang, N., Karanasios, S., & Anwar, M. (2020). Exploring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older persons during disaster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1(6), 619–631.

<https://doi.org/10.1002/asi.24294>

Pehlivanoglu, D., Lighthall, N. R., Lin, T., Chi, K. J., Polk, R., Perez, E., ... & Ebner, N. C. Aging in an infodemic: The role of analytical reasoning, affect, and news

consumption frequency on news veracity dete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https://doi.org/10.1037/xap0000426>



Pennycook, G., & Rand, D. G. (2021) The psychology of fake new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5(5), 388-402.

Pian, W., Chi, J., & Ma, F. (2021). The causes, impa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VID-19 Infodemic: A systematic review using narrative synthesi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58(6), 102713–102713. <https://doi.org/10.1016/j.ipm.2021.102713>

Ratcliffe, R. (2022). Instagram: meet Thailand’s new generation of over-60s influencers. *The Guardian*. Retrieved August 13, 2020,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l/25/instagram-meet-thailands-new-generation-of-over-60s-influencers>

Rocha, Y. M., de Moura, G. A., Desidério, G. A., de Oliveira, C. H., Lourenço, F. D., & de Figueiredo Nicolete, L. D. (2021). The impact of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and its influence on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10. doi:10.1007/s10389-021-01658-z

Santos, C. M. D., Frichembruder, K., Severo, M. B., Gehrke, G. H., Cavalcante, R. B., & Bulgarelli, A. F. (2021). Headache in Brazilian older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infodemic. *Revista Brasileira de Geriatria e Gerontologia*, 25(6). <https://doi.org/10.1590/1981-22562021024.210240.en>

Schäffer, B. (2007)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Seniors.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1), 29–42. <https://doi.org/10.2304/rcie.2007.2.1.29>

Shu, K., Wang, S., & Liu, H. (2018) Understanding user profiles on social media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In 2018 IEEE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retrieval (MIPR) (pp. 430-435). IEEE.

- Skurnik, I., Yoon, C., Park, D. C., & Schwarz, N. (2005). How warnings about false claims become recommend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4), 713–724.
<https://doi.org/10.1086/426605>
- Smith, J. A., & Shinebourne, P. (2012).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Tsai, H. Y. S., Shillair, R., Cotten, S. R., Winstead, V., & Yost, E. (2015). Getting Grandma Online: Are Tablets the Answer for Increasing Digital Inclusion for Older Adults in the U.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41(10), 695–709.
<https://doi.org/10.1080/03601277.2015.1048165>
- Tsai, H. Y. S., Shillair, R., & Cotten, S. R. (2017). Social Support and Playing Around: An Examination of How Older Adults Acquire Digital Literacy With Tablet Computers.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36(1), 29–55.
<https://doi.org/10.1177/0733464815609440>
- Turner, P., Turner, S., & Van de Walle, G. (2007). How older people account for their experiences with interactive technology.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6(4), 287–296. <https://doi.org/10.1080/01449290601173499>
- V-DEM Institute (2018). Foreign government disseminat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digitalsocietyproject.org/foreign-intervention-on-social-media/>
- Van Dijk, J. A. (2006).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Poetics (Amsterdam), 34(4), 221–235. <https://doi.org/10.1016/j.poetic.2006.05.004>
- Vaportzis, E., Giatsi Clausen, M., & Gow, A. J. (2017). Older adults perceptions of technology and barriers to interacting with tablet computers: A Focus Group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687–1687.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1687>
- Vijaykumar, S., Jin, Y., Rogerson, D., Lu, X., Sharma, S., Maughan, A., Fadel, B., de Oliveira Costa, M. S., Pagliari, C. & Morris, D. (2021). How shades of truth and age

affect responses to COVID-19 (Mis)information: randomized survey experiment among WhatsApp users in UK and Brazil.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8(1), 1–12.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1-00752-7>

Vosoughi, S., Roy, D., & Aral, S.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359(6380), 1146-1151. doi:10.1126/science.aap9559

Wang, C. H., & Wu, C. L. (2022).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e smart TV as a platform for digital literacy among the elderly.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head-of-print(ahead-of-print), 1–14. <https://doi.org/10.1080/0144929X.2021.1934732>

Waszak, P. M., Kasprzycka-Waszak, W., & Kubanek, A. (2018). The spread of medical fake news in social media—the pilot quantitative study. *Health policy and technology*, 7(2), 115-118.

Watson, A. (2020). Share of adults who have seen fake or made up news about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of March 2020, by political affili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05067/coronavirus-fake-news-by-politics-us/>

Williams, M. (1997). Social surveys: design to analysis. *Social research: issues, methods and process*. Buckingham.

Wong, F.H.C., Liu, T., Leung, D. K. Y., Zhang, A. Y., Au, W. S. H., Kwok, W. W., Shum, A. K. Y., Wong, G. H. Y. & Lum, T. Y.-S. (2021). Consum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VID-19 on social media among older adul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anxiety, social trust in information, and COVID-safe behaviors: Cross-sectional telephone surve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3(2), e26570–e26570. <https://doi.org/10.2196/26570>

Wuyckens, G., Landry, N., & Fastrez, P. (2022). Untangling media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digital literacy: A systematic meta-review of core concepts in medi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14(1), 168–182.

<https://doi.org/10.23860/JMLE-2022-14-1-12>

Yuan, Z., & Jia, G. (2021). Profiling the digital divide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Internet big data: evidence from China. *Data Science and Management*, 3, 33–43.

<https://doi.org/10.1016/j.dsm.2021.10.001>

